

序

这是一群在五十年代的阳光下成长起来的女大学生们晚年的回忆。那时她们朝气蓬勃，满怀理想；她们对“英特纳雄奈尔一定要实现”坚信不移；她们将艰苦奋斗作为自己必修的功课，将无私奉公作为自己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将服从祖国需要作为人生的最高信念。几十年来，她们就是抱着这种信念，在时代的洪流中奔流激荡，为时代为社会为国家付出了自己的一切。

在几十年的风雨沧桑中她们成熟了起来。但年华流逝，时不我待。今天她们都已退休，都成了奶奶或姥姥，都过起了温暖幸福的生活。但与所有的老年人一样，她们却又常常沉湎在向晚辈一遍又一遍地讲述那些多姿多彩、颠簸坎坷的往事之中。她们虽都是一些在平凡岗位上做着平凡事情的平凡人，但是却都经历了不平凡时代不平凡形式的洗礼。她们每个人都是一部书，都是一部跳动着时代脉搏和闪烁着时代足迹的书。

开卷有益。愿年长的读者与作者们一起去重温那个不平凡的时代，愿年轻的读者在人生旅途上与作者们一样穿过荆棘，趟过沼泽，留下自己不畏险阻、艰苦攀登的金色足迹！

郑守仪

一九九九年八月

平凡足迹

李本川

作者为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研究员，1935年生，山东荣成人。

我今年63岁了。大前年丈夫和儿子在一个月内先后离开了人世，女儿又已出嫁，现在是孑然一身。我是个遇事一往无前，向来不往回看的人，但这几年来家庭生活简单了，回家后闲暇的时间多了起来，那些曲回的往事不免常常涌向心头：那坎坷劫难的“十年”文革；那春光明媚的大学生活；那艰苦向上的青少年时期；那童年的美丽画卷；那生我育我的父母、亲人和故乡的小山村。这一切都恍如昨天的事情，大概这就是上了年纪的人共同的心理状态吧。于是我便决定将这些往事梳理一下，让思绪沿着我身后60余年来留下的一行长长的、弯曲的足迹再从头走上一遍。于是我又发现这些足迹大多是留在平坦的大道上，但有时也留在了荆棘丛生的山路上和一望无际的沼泽中。不管它留在什么地方，我都要把它记叙下来，留给走在我后面的人。愿他们穿过荆棘，趟过沼泽，在人生的旅程上留下自己不畏险阻、艰苦攀登的金色足迹。

童年

1935年7月10日，我出生在山东半岛最东端的一个小山村里。村子西边是海，村子北边也是海，村东隔着一座山还是海。在我们那里，凡位于山麓的村庄，都是以山命名，因此这里的村名大都叫着什么山村。我们村是以村边一座小山命名的，叫土山村。村东南的一座山叫东山，所以我们那个镇就叫东山镇。这里是一片濒临大海的丘陵地带。我的童年就是在这个三面环海，一面接陆的有山，有海，风景秀丽的小山村里度过的。

虽然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但童年的往事仍历历在目。

据母亲说当我哇哇落地时，村里一位叫李有芳的爷爷第一个走进来我们的家门，他在北京大学上过学，又是共产党员。全家人都非常高兴，因为我们那里有个说法，孩子出生后，外人谁第一个见到孩子，这孩子将来就像谁，这叫“踩生”。说来也奇怪，20年后，我真成了村里有史以来第二个大学生，应验了“踩生”的说法。母亲还说我刚生下来就瞪着一双圆圆的大眼睛，顶着一头乌黑的头发，体重八斤多，哭声高亢宏亮，活脱一个男孩子。在那重男轻女的社会里，全家人倒也没有轻视我，特别是经有学识的人“踩生”，这使全家人都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对我十分疼爱。但据说，这个给我“踩生”的人后来脱了党。

我母亲一生生下来12个孩子，我排行老四。但我的两个哥哥、一个姐姐和三个弟弟妹妹，都在童年时夭折了，所以我就成了老大，而活下来的只剩下我们姊妹六个了。

当我长到四五岁时，身体比一般男孩还壮实。记得我六岁那年春节，邻居宝叔，从高丽的仁川回家过年。大年初一那天，他手里拿着一包铜钱，把村里的几十名孩子，召集到大街十字路口处。让我们排成一行长队，地上放了一块大石头，然后让每个人抱起那块石头，在两条横线之间奔跑，跑一个来回给一枚铜钱。除我以外，没有一个女孩子能抱起那块大石头，也没有几个男孩子能抱着石头跑上几个来回。而我，在围观的男女老少一片喝采声中，不知跑了多少个来回，只记得宝叔的那一大包铜钱，几乎都装进了我的口袋里。从此“假小子”的绰号在小山村里传开了。

直到我上了中学，在专区和省运动会上拿到了奖牌后，我才意识到儿时那次活动，就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少儿运动会，我的业余体育生涯，从儿时就开始了。

小时候，我很喜欢爬树，无论多高的树，我都能爬上去，走在树杈上如履平地。村南有棵大歪脖子树，我和小伙伴们最爱在这里爬上爬下。有时还折断树枝筑巢为乐，闹得本家永吉爷爷不知说过我们多少次，但我们根本不听。后来永吉爷爷干脆在树干上抹上屎，可我们待屎干后仍照爬不误。我们周围只有寨前于家才有高小，我们村的同学每天都是在这棵大树下集合，一起跋涉六七里路桥上学。一次，我来得早，便把书包放在地下，爬上了这棵大树等候同学们，不料跑来一条黑狗，扒开我的书包，把我带到午饭叨走了，待我从树上滑下来，狗已跑得无影无踪，使得我饿着肚子上了一天学。这种爬树的本领，几十年后早已因无用

武之地而遗忘了，但 1988 年我已 53 岁了，有一次将钥匙忘在家里，我便找了一根竹竿，打在墙上，顺势爬上凉台，回了家。这件事至今在所里还是一个小小的传奇式的逸闻。

与所有的孩子一样，我最感兴趣的游戏莫过于捉迷藏，我们家乡叫着“趴蒙儿”。这种游戏之所以能吸引孩子，是因为它都是在天黑后进行，在极强的对抗性中又蒙上了一层军事和恐怖色彩。对垒的双方，被捉到一方多是藏在草堆后、过道里，甚至鸡窝中或驴栏里。但有一次我提议我方藏到那棵大树上我们筑的巢里，对方怎么也找不到，结果我方获得全胜。更有甚者，一次我藏到了村外的莹地里，这使全村的小伙伴乃至大人都为之目瞪口呆，大人们都说“这孩子太‘疯’了”。儿时我之所以这样泼辣，与母亲对孩子的教育观有很大关系，母亲认为小孩子疯跑，可以免灾消病。有的孩子经常因为藏在驴栏里，被父母发现而挨一顿打，因为草料被踩后，驴就不爱吃了。但我向来未因闯这样的祸而被打过。有一次捉迷藏把一双新鞋丢了，不敢回家，母亲出来找到我，不但没有说我，反而安慰了我，回家后又给我做了双新鞋。就这样，我小时候尽是跟男孩子一起爬树掏鸟窝、捉知了，上山拾草、挖野菜，下海摸鱼、捉螃蟹。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假小子”。

由于我长得壮实，力气又大，自然就成了弟妹们及村里女孩子的“保护伞”。谁受到了男孩子的“欺负”，我会毫不犹豫地替他们“报仇”。所以许多男孩子也惧怕我三分。屡屡为别人抱

打不平，难免给父母招惹麻烦。有一次我把一个比我还大的男孩子，从山上追打到山下，最后干脆把他推进水坑里，差一点惹了大祸，现在想起来都感到后怕。。。。。

小时候，一起爬树、捉迷藏，一起玩耍的小伙伴有许多后来参了军，有的已血洒疆场，有的成了我军优秀干部。记得当年被公认的精灵鬼、各种恶作剧的组织者李福臣参军时因体重不够，而在口袋里装了两块石头，后来成了驰骋在解放战争战场上的勇士，离休前在南京军区工作，师级干部；李福本、李本兰也都成了我军的高级干部。

这些飘渺的往事真是如诗如画，但我和我同龄人那如梦的童年画卷却常被战火蹂躏得支离破碎。因为那是一个国难当头的年代，幼小的心灵经历着鲜血、死难、飞机狂轰滥炸的洗礼。虽然记忆模糊，但至今那鲜血淋漓的场面，犹在眼前。

记得五六岁那年冬的一天，说是祥爷爷家出事了，我们这些不懂事的孩子一齐跑来去，进门一看，祥奶奶和她的独生女遮子姑姑扑在已经死去的祥爷爷身上，哭得死去活来。我记得祥奶奶的身上、手上及遮子姑姑俊俏的脸蛋上都沾满了鲜血。我们家族及村里的许多人都来给死去的祥爷爷换衣服，擦洗身上的血迹。后来爸爸和叔叔们抬了一口棺材来，把祥爷爷安放在里面，可是遮子姑姑死活不让盖棺，一个十七八岁的大姑娘撕心裂肺的哭声，至今犹在耳边。

懂事后，听大人们说，那是 1940 年冬天，日本鬼子下乡扫荡，我们本家的李祥吉爷爷在山外拾粪，与鬼子相遇，一个日本军官一枪打中了祥爷爷的左肩，鲜血直流，染红了祥爷爷的棉袍，走了没几步就倒在了血泊里。当人们将他抬回家时，就已经断气了。但祸不单行，在鬼子的另一次扫荡中，又把遮子姑捉走了。村里花了很多钱也没赎回来。听说因为她长得漂亮，日本人让她当了妓女，从此以后就再没有她的音讯。如果她还健在的话，应该年近八旬了。祥奶奶失去了丈夫和心爱的女儿后，哭瞎了眼睛，没有多久也与世长辞了。直到现在我还期盼着我的遮子姑姑能奇迹般出现，回到我们家乡。

我七岁那年的冬天，有一天听村里人说这东海边潮上来我们 18 个战士的尸体，乡亲们流着泪掩埋了烈士。一些细心的老人还数了数每位战士的牙齿，说他们都只有 24 颗牙，还都是一些连牙齿都没有长齐的小青年！

后来听大人们讲，这是一次残酷的战斗。1941 年冬日本鬼子对山东半岛实行拉网大扫荡，我们一支部队从烟台被逼到半岛的最东端我们家乡附近的东海边。这天下午鬼子强迫附近村庄的老百姓送了大量柴草到我们村西的野地里，每隔几十米发一堆火，火光照得几里以内如同白天。我们部队挑了十八名勇士向相反方向放枪迷惑敌人，而大部队从火堆中冲杀了出去。最后十八勇士跳海壮烈牺牲。。。。。

从祥爷爷的死到遮子姑姑被抓，到这十八勇士的壮烈牺牲，这一切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仇恨的种子，凡是抗日的事，我都去做。如拥军优属、演活报剧、站岗放哨、送鸡毛信等我都一马当先。我还被区里评为模范儿童团长。

我上学后，大概是1943年，有一天我们全区的各界群众，我记得有妇救会员、青抗先队员和儿童团员都赶到峨石山村开欢送大会，欢送百余名青年参军八路军。会场设在一片收完庄稼的田地里，会场中间搭了个很大的主席台。参军的青年戴着大红花，一排挨一排坐在主席台上，一个个脸上堆满骄傲和幸福的微笑。我们井然有序地坐在台下。儿童团员坐在主席台前。全场人山人海，歌声、拉拉队声此起彼伏，一片欢乐的海洋。记得当时最响亮一首歌是：八路军、独立营，谁参军谁光荣。骑着马，挂着红，光荣、光荣、真光荣。。。。。

会议刚开始，就隐隐约约听到飞机的嗡鸣声。主席立即大声宣布：“有情况！按事先定好的路线疏散、隐蔽。。。。。”那时每次开大会前都先公布防空疏散路线，而且人们都有些防空知识，如来不及跑远，就就地几个人围在一起，头顶着头，弯下腰，手扶膝盖，装成是一堆土或一堆粪，或是躺在飞机来向的背面地堰下面，不能藏在大桥下或大建筑物下等等。这时，我们儿童团员被围在会场中心，来不及疏散了，就在老师们的指挥下，就地组成“一堆一堆的土堆”。不一会数不清有多少架飞机在我们上空盘旋，接着就是炸弹的轰隆声，一时间空中尘土飞扬，硝

烟弥漫。人们哭叫连天。一位高个子校长，被第一批炸弹炸伤了手臂，鲜血直流，精神也错乱了，哭叫着在人堆里乱跑。被我们的林校长拉住按倒在地，接着又是一颗炸弹落在他身边，多亏他已躺下，这次只是盖了一身土，没再炸伤。但因他胆小无错的表现，后来受到了批评。

敌人这次轰炸造成的伤亡很大，具体伤亡数字我不清楚，但全区几乎每个村都有伤亡人员。就连远离会场近十里的我们村，也被炸伤了一位奶奶，至今她已年过九旬，腿上还存留着日本鬼子给炸的伤痕，一拐一拐地走路。

事后人们都传说，这次大轰炸，是汉奸用“电匣子”报告了驻青岛的日军，飞机是从青岛飞来的等等。从那以后再没举行那样大规模的欢送会。但强烈的民族仇恨，激起了群众更高涨的抗日热情，送郎参军、送子参军的激动人心的场面处处可见。当时我还表演了一出打花棍的小秧歌舞，走村串巷进行表演。歌词是：“一根那个花棍儿，一条心，王大嫂送郎去参军。王大哥参加了八路军。王大嫂在家中，纺花织布苦用功，哎呀哎咳哟，抗日的家属真正光荣嘛，哎咳哟。”

我大舅的两个儿子和女儿，小舅的一个儿子都参加了八路军，大舅舅家门上挂着“一门三战士”的光荣牌。人们经过那里都仰慕不已。我的表哥、表姐今天都是我军的高级军官或身居要位的地方干部，前几年都已相继离休了。

那时拥军优属非常热闹，每逢节日，我们儿童团、妇救会就挨门挨户募集馒头、粽子、鸡蛋、巧花等，送给子弟兵和各家军属。但，无论大人，孩子对日本鬼子和汉奸都切齿痛恨，过年时给“伪属”挂黑灯。

有一年冬至那天，在我们村北岗上有一颗血淋淋的人头放在一座坟墓上，旁边石头下面压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汉奸的下场”。吃晚饭时我详细地给全家人讲述那颗人头的情况。父亲瞅了我一眼不让我说。过了一会我又不自觉地说起来，我说那个人头有一只眼睛还睁着，看来像个年轻人。父亲火了，说：“饺子还堵不住你的嘴吗？”我不敢再说了。至今我也不明白父亲为什么不让我讲。这件事莫非是父亲他们干的？因为父亲那时已是地下党了，遗憾的是长大后我再没问过父亲。

还有一次是我们区在干占村（曾改为来国村，就是全国著名战斗英雄魏来国的家乡），召开全区公审大会，审判当地一个有名的大汉奸王西岳。他曾留学日本。据说当时我们地下党对他做了许多工作，争取他抗日，但他死心塌地地做汉奸。为了打击汉奸的嚣张气焰，决定处决他，临刑前他还高喊反动口号。民兵一枪击中他的脑袋，脑浆四溢，这是我有生第一次看到枪毙人，以至从那以后，我看到猪、羊、狗等动物的脑浆就恶心，从来不吃任何动物的脑子。这次公审大会，大大震慑了汉奸、卖国贼，听说有不少人改恶从善，大长了抗日军民的志气。也激起了我幼小心灵中的爱国热情。

在我的记忆里，不知为什么对抗日战争时儿童团里的事情记得那么清楚，而到后来年龄大了，对解放战争时期的事反倒记不那么清楚了。只记得那时从学校到村里，人人都为支前做贡献，妇女织布、做军鞋，学生编草帽等等。我还记得我们学生为配合向蒋军士兵进行宣传，做过“瓦解袋”，但后来因为战场离我们很远，没有用上。再就是记得我父母 1946 年双双被评为我们荣成县的劳动模范。1947 年国民党反动派重点进攻胶东，学校停办。那年我 12 岁，我是父母的长女，又有一副男孩般强健的体魄，所以自然就成了父母家务和农业劳动的得力助手。我不但从母亲那里学会了纺棉花、织土布，支援解放战争，还从父亲那里学会了科学种田。挑、担、推、拉、锄、割等农活样样能干，还会扶犁耕种、推独轮车等高级农活。乡亲们称赞我是“少年强劳力”。

1950 年《大众日报》报道了掖县高小毕业生徐建春同志，没考取中学，回乡务农，不怕脏，不怕累，起早贪黑下地干活，成了山东省劳动模范。乡亲们都说，咱们的“假小子”如果考不取中学，也能当劳动模范。当然，这是乡亲们的推理。

童年的往事，毕竟太遥远了，有些清晰、有些模糊、有些遗忘了。但有一件小事却始终伴随着我回忆的思绪长达几十年之久：我们家乡流传着一首民谣“九月里，九重阳，糯米做酒菊花香”。我们那里不产糯米，而产大黄米。我家每年都可收获百余斤大黄米。儿时母亲每年都用家中那口淡绿色的大缸，做满满一缸黄酒。

那酒既香又甜。妈妈经常盛出一大葫芦瓢，分给我们兄弟们喝，我可以连喝三大碗。妈妈高兴地说：“海量，你真像个男子汉！”。参加工作后，我也曾喝过茅台、五粮液等美酒，有时一次也喝上一斤或八两的。但总觉得没有母亲做的酒那么甜、那么美、那么醉人。。。。。

亲人

在我的亲人中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我的母亲、姑姑和父亲。

我的父亲是30年代末的老党员，抗战期间担任我们村的各救会会长，解放战争直到解放后一直担任村里的主要干部，50年代中期高级农业合作社成立后他任社长。他只读过几年书，但却是我们村里的秀才。村里逢年过节及红白喜事时写对联、写喜字，写挽联、点神主，乡亲们都来找他，十里八村也是个有影响的人物。在务农上父亲的最大特点是不墨守成规，敢于探索科学种田，是远近闻名的靠科学和勤劳务农而过上富裕生活的。父亲在家里很严肃，对我们说话总是训斥的口气，所以我们姊妹们都怕他，对他都敬而远之。虽然他对我的影响很大，但我们与父亲在感情上的交流，远不及母亲与姑姑。

母亲和姑姑，无论从长相，还是性格都绝然不同。说来奇怪，人们竟说，我既像母亲，又像姑姑。但细想想，女儿像母亲是天经地义的，“侄女像姑，不像也乎乎”也有道理。

我的母亲是一位勤劳、智慧、刚强，勇于创新，乐于助人的女性。在抗日战争期间，妇女救国会成立那年她取名王成会，意思是纪念妇救会的成立。她生于1908年，长相俊美、身材窈窕，是村里三大美人之一。她性格开朗、活泼大方。青少年时期，同龄女孩都过着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生活，而母亲却敢于和男孩子一起到南庄北疃看戏、走亲戚，还愿意下地干农活，到海边挖蛤蜊、打蛎子。在那时，一个俊俏女孩子这样抛头露面，难免招惹非议。但母亲从不在乎，一向我行我素。她常说：“身子正，不怕影子斜”。

19岁时母亲和父亲结婚，那时我们家老少三代14口人。曾祖母是大家闺秀，慧眼识才，母亲刚过门就把这个大家庭，交给她掌管。母亲还真有点王熙凤的气度，把家庭料理得井井有条，全家人个个满意，很快母亲的美名就在全村传开了。

40年代初，母亲就走出家门，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她和村里一名地下共产党员组织妇女救国会，挨门挨户动员妇女参加抗日救亡工作。她带着剪刀给大姑娘、小媳妇剪去了发髻，变成了“随八路军的二毛子”。有的顽固老人，不允许自己的闺女、媳妇剪发。母亲则发挥她能言善辩的才干，一户户做通了工作。就连村里最顽固的、还留着清代小辫子的二圣老头，也在母亲多次做工作后，剪掉了那条“封建尾巴”。

1942年，日本鬼子下乡大扫荡，为了减少伤亡，党号召青壮年都隐藏起来。村里只剩下妇女、儿童和老弱病残者。日本鬼子

在我们村放火烧房子，火势凶猛地“吞噬”着一间间民房，大家急得摩拳擦掌，但慑于鬼子的淫威，谁也不敢出去救火。鬼子刚离村母亲就带领全村妇女、儿童救火。她第一个爬上来房顶，机智地切断了火源，终于扑灭了大火，受到了区里的通报表扬。

最令人敬佩的是母亲的大公无私和助人为乐精神。在她担任妇救会调解委员及村学主任期间，乃至以后的几十年间，不知为多少家庭调解了矛盾，使得不少夫妻破镜重圆，为数十对青年男女牵线搭桥，喜结良缘。她不但从未收取任何人的分文礼品，相反却常把现款、粮食、衣服无代价地支援那些贫困的人们。不管是本村，还是外村的人，有了困难，都愿去找母亲帮助。解放后，她更是如此，每当向灾区捐助时，她总是慷慨解囊。

母亲没上过正规学校，只上了两年妇女识字班。但她非常尊重知识。我们兄妹六人都能上学，全靠母亲的鼓励和支撑，使我成为家乡解放后第一个女大学生。在培养我们兄妹求学过程中，母亲历尽了千辛万苦。她虽然是个小脚女人，但亲自下地，并把收获的小麦拿到集上换成粗粮，省下点钱供我们上学。她还亲自为我们织出来各种花色的条条布、格子布，我们穿着母亲设计制作的土布花衣，在那时觉得非常风光。至今我还保存着一床条条花样的土布被里。这是一件无价之宝，我将永远珍藏着。

人们都说我是母亲的影子，母亲也常常自豪地说本川的脾气最像我。

1994年1月母亲离我们而去了，我们兄妹为母亲竖碑曰“履新育秀，固本荣枝”以此颂扬母亲一生的伟大。

我的姑姑李翠云，是一位心地善良、温柔贤惠、心灵手巧、少言寡语、能忍能让的典型农家妇女。她体态高大粗壮，一双半大脚，满脸大麻子。但是，由于她有一颗金子般的菩萨心肠，人们并没有因为她的外表丑陋而歧视她。相反许多人都同情她，说她好人没好命。

姑姑自知长相丑，所以很少在公开场合抛头露面。她自小跟我的曾祖母学会了一手漂亮的针线活，绣花、结发网，裁缝绫、罗、绸、缎样样能。村里的人嫁姑娘、娶媳妇，都求她帮忙。她总是有求必应，而且做得又快又好，保人满意。

但是她的婚姻却历尽坎坷和磨难。姑姑没生天花前就与当地一位地主的儿子定了娃娃亲。20岁那年出嫁了。她丈夫也是一个大家庭，上有公公婆婆，下有小姑、小叔子，还有大姑姐及三个妯娌。为了在这个封建大家庭中争得一席之地，每逢回娘家，姑姑都是日夜不停地做针线活。给公婆做鞋帽；为小叔子做衣裤；为大姑子和小姑子绣针头；为妯娌们做围裙。在婆家她就没黑没白地为这个大家庭忙碌着，忙完家务活，忙农活，一天下来，两腿肿得像个水桶，晚上上炕都拉不动腿。然而，这一切并没博得那个封建婆婆和刁诈的大姑姐的好感。她们挑拨姑姑和姑父之间的关系，折磨姑姑。对于这一切姑姑都是忍气吞声，从不对任何人倾诉。但那时我们那里已是民主政府，男女平等的思想已深

入人心，这种双重的压迫渐渐使姑姑觉醒了，终于提出离婚的要求。

离婚那天是我陪姑姑去办理的手续。我帮姑姑离婚的消息，很快在家乡传开了。人们夸奖我“口才好，能讲理”。甚至还有一位象姑姑一样受婆婆虐待的妇女，登门求我去帮她离婚呢，但被爸爸拒绝了。后来姑姑又找了一个雇工结了婚。

因为姑姑家一贫如洗，我们便经常接济她。记得有一年初春，我和大妹本河每人挑着一担萝卜和地瓜送给姑姑，当走到离姑姑家还有三里路时，天已经黑了。前面就是“黄子乔”。那是个黄鼠狼出没的地方，白天走在那里，都觉得阴森可怕，况且是夜晚。开始两人都不敢吭声，全身被汗水都湿透了。突然妹妹停下来脚步，颤抖着对我说：“姐姐，我走不动了，把萝卜丢掉一些吧，咱们快点走。”我想，一个萝卜就够姑姑吃一顿，怎么舍得丢掉呢。妹妹是被这恐怖的“黄子乔”吓破了胆，怎样才能给妹妹壮胆呢？于是我大着胆子对妹妹说，咱们唱歌吧，终于走出了这一里多荆棘丛生的崎岖小路。姑姑见到了我俩，心疼地抱在怀里直掉泪。那年我只有12岁，妹妹10岁，挑了足足有100多斤萝卜和地瓜，走了20里山路，经历了10个多小时的跋涉。

这件小事，使姑姑感动不已。虽然她老人家已年近八旬，但每逢提起此事，总是两眼泪汪汪地说：我的侄女比亲生儿女还孝顺。

其实，我姑姑对我们兄妹，更是恩重如山。远的不说，1994年我86岁的老母亲大腿骨折，不能自理，我们兄妹本打算轮流请假回家照顾母亲。但姑姑竟挺身而出担负起照顾我母亲的任务。她说：“你们都是国家的人，不能耽误你们的时间，就把你妈交给我照顾吧。”从此，姑姑日夜守护着我母亲身旁，做饭、洗屎、洗尿布，直到母亲离我们而去。人们都夸奖说：“小姑子这样耐心地伺候嫂子，真是世上难找。”

姑姑爱我，我更爱姑姑。自我懂事起，一直把姑姑和母亲同等对待。参加工作后，不论自己的经济怎样窘迫，都要挤出点钱寄给她老人家。姑姑没有子女，我们决心让姑姑过个幸福的晚年。不料，我和弟妹们寄给她老人家的钱，她基本都存在银行里。今年我回家看望她老人家，当我掏出200元给她时，她说：“我有钱，你自己留下买件衣服穿吧。我知道多少年来，你总是想着这个，挂着那个，自己不舍得吃穿。看看你身上穿的，连农村人都不如。”老人一边说，一边流泪，并悄悄告诉我，她有数千元存款，这钱她不准备用，说等她百年之后，谁寄给她的钱，还给谁。听着姑姑的话，我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我告诉她，我们兄妹都过得很好，不需要分她那几千元钱。听我的话，姑姑点点头说：那就用它帮帮穷人吧。我相信姑姑是个说到做到的人，我支持姑姑的选择，就让那些钱跟姑姑一起去助人吧！

求学之路

1949年底我在荣成县潭村林家高小毕业了。毕业前夕，我光荣地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当时在我们那个地区的高小毕业生，比现在的大学生还少。又适逢新中国刚成立，各行各业都需要大量建设人才，特别是教育事业大发展，师资奇缺，我的同学大部分走上了教育岗位。当时摆在我面前的路有几条：一是做小学老师；一是回家务农；再就是进工厂或给部队首长看孩子。当然我还是想继续上学，但要上学首先要考虑到家庭的经济状况，父母是急需我参加工作或回家务农，帮他们养家糊口；再就是我们那里十分闭塞，要上学也不知道哪里有学校，因此，到底干什么，心中七上八下的，感到十分茫然。

这时正值寒冬，那时冬季是农闲季节，一般农民都闲暇无事。可我父亲是县里的劳动模范，又懂得科学种田，又值我毕业无事，所以他就每天和我一起，赶着我们家那头黑色小毛驴，一起下地冬耕。父亲扶着犁，我和小毛驴拉犁。一面干活，父亲一面给我讲冬耕的道理。他说，冬耕不但疏松土壤，还能把害虫及虫卵翻到地面上冻死，明年就可以减少病虫害，而获得丰收。拉犁是最重的农活，尽管我有“假小子”的力气，但是一天拉下来，棉衣都被汗水湿透了，有时累得我上气不接下气，半天也不说话，晚上回到家里，连晚饭也不吃就和衣而睡了。母亲心疼地说：“小猪子肉不耐滚。”就偷偷煮两个鸡蛋，等弟妹们都睡熟了把我叫起来吃下去。这样干了几天，我就向父亲提出，我要学着扶犁。扶犁轻松，但是个技术活，在那时我们那里还没有女人会扶犁。

说来奇怪，我学农活，有一种特殊灵感，一学就会。我成了家乡的一个会扶犁耕地的女孩子，全家人都为我感到骄傲，乡亲们也都对我赞不绝口。冬耕刚完，接着父亲又带领我和大妹本河挑沙压碱改良黄土地。没完没了的农活，一直干到腊月二十八日，我才在家帮助母亲忙年。

就在忙年时，一位亲戚来我家，对我妈说：“本川念书好，你们怎么不让她上中学呢？”这突如其来的提醒，使妈妈恍然大悟。妈妈详细向她询问有关情况，她答不上来，但她让去找他们村一位中学生问问。这一喜讯，把近一个月来沉闷心情，一扫而光。我立即跑去找那位中学生，他告诉我，我们周围八个县有两所初级中学，一所是“威海中学”（现在的威海一中），一所是“东海中学”（现在的文登三中）。两所学校距离我们家都是一百六七十里路，“东海中学”位于昆嵛县虎山区许家埠村，这位同学就是“东海中学”一级的学生。据他讲该校今年春节后，就在我们荣成县河南村设考场招生。这一喜讯不但使我沉闷的心情豁然开朗了，甚至夸张点说它决定了我一生的命运。春节过后，我和同学结伴步行 70 余里到河南村去参加升学考试。

50 年代初，我们家乡十分寒冷。春节过后，仍是滴水成冰。我们的考场设在河南村外一片收割完了的豆地里。头一天我们就到达河南村，办完报考手续，当晚在农民家的过道头上过夜。几个人背靠背坐在一起，一会脚就冻麻木了，于是就起来跑一阵，

跑累了，再坐下来。这样坐坐、跑跑、跑跑、坐坐，折腾了一整夜，谁也没合眼，好不容易熬到了天明。

开考后，刺骨的西北风，夹着纷纷扬扬的清雪花，冻得考生们个个瑟瑟发抖，我的手冻麻木了，拿不住笔。钢笔冻了，写不出字来，用口呵一呵，写几个字，但一会又写不出来了。急得我简直要哭出来。那时除监考老师拿着一块怀表外，其他人谁也没有表，但凭感觉时间快到了，我的卷子还没答完一半。无奈我大胆地站起来：“报告老师，我的笔写不出字来。”我的话音刚落，立即引起全场一片共鸣。几位监考老师凑在一起研究了片刻，立即宣布：可以用铅笔答卷，延长半小时考试时间。就这样，我们在野地里整整一天，考完了全部课程——语文、算术和常识。

当晚我们又拖着疲惫的身体回了家。经过两天两夜的冻、饿、累，回家后我就发高烧，几天卧床不起。妈妈心疼地说：“孩子，放心吧，你一定能考取。因为你去投考那天，我给你煮了四个鸡蛋，结果爆了一个，这是你能考取的兆头。”尽管这是迷信。但我也有预感，我能考取。因为我自觉考得不错，特别是那篇作文《我的自述》，写得很好。这不仅因为我的童年生活是丰富多采的，还因为考试前我阅读了一篇《银元的自述》，给了我借鉴。事情果然不出所料，我被东海中学录取了，当时录取率很低，好像在百分之一二的样子。这像一颗炸弹在家乡爆炸了，人们奔走相告。我成了新中国成立后，家乡第一批中学生。

1950年2月底，我自背行李和王淑珉同学一起，踏上了去东海中学的路。我们两个小姑娘（她15岁，我14岁）从家乡出发，晓行夜宿，穿过荣成县、文登县及昆嵛县的一大半，经过两天半的奔波，终于到达了目的地。我第一次出这样的远门，一路上的艰难险阻，数也数不清。过著名的母猪河大桥那一幕，现在还记忆犹新。这座桥是通向东海中学的必经之路。此桥名为“望仙庄大桥”。从桥名到村名都意味着，只有敢于过河的人，才能望到“仙境”。要过此桥是需要足够的胆量和勇气的。桥是由东到西，用木板凌空架起，高约五米，宽仅一米多，旁无栏杆，长约一里路，在北风的呼啸下还吱吱作响。面对此情此景令人望而生畏，不禁却步。但是，路是要走的，河是要过的，“仙境”是要看的，为了取得过河的经验，先空身试走了多次，最后终于背上了行李，踏上了呼扇呼扇的大桥。在精神高度紧张的时候，就蹲在桥上，闭上双眼，镇静一会，待心情平静后再走。就这样走走蹲蹲；蹲蹲再走走，终于用智慧和勇气，战胜了前进道路上的险阻，跨越了“望仙庄大桥”。。。。。

到了东海中学，我的心情宛如抗日战争时期知识青年到了延安。我们的校训也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我们的同学来自荣成、文登、威海、昆嵛、乳山、海阳、牟平、福山八个县市。

我现在还记得到校后的一个夜晚的情景：我们13位女同学都睡在一个大通铺上，我因过度兴奋怎么也睡不着，但后来发现

大家几乎都睡不着。在我旁边的常宏传同学抽泣起来了，我便小声跟她说：你要是冷，就到我被窝来吧！不说还好，这一说她竟呜呜地大哭了起来，她这一哭便引起了全宿舍一片哭声，开始我还纳闷，后来才知道她们都在想家。。。。。

我们的校舍是一个地主的庄园。宿舍是邻村几个村庄的破旧房。冬不挡寒，夏不避雨。冬天雪花可以从门缝和窗棂间飘到我们的床铺上，到了夏天则蚊蝇横飞，老鼠、蛤蟆、蛇也是宿舍的“常客”。有一次，我们宿舍的门框上面垂下一条蛇，吓得我们不敢出门。

我们吃的是小米、高粱面和地瓜干。“早就咸菜，午喝汤，晚饭就的是白菜帮”这是当时在我们学生中流传的顺口溜。每逢寒假放假回家，学校按路程远近发给高粱面窝窝头做干粮。我们荣成县路途较远，发给两天的窝窝头。放寒假时，我们冒着零下十几度的严寒赶路，窝窝头冻得梆梆硬，一口咬下去，就是一道白花花的冰碴子，但谁也不舍得花一百元钱（相当于现在的一分人民币）到饭铺去热一下。

我们的老师，除了校长和教导主任是本地人外，其他大部分是政府从江苏、浙江一带招聘来的知识青年，老师的生活也比较艰苦，他们每月也只有 300 斤左右小米的薪水。

尽管我们的条件这样简陋，生活这样艰苦，但是我们的同学不仅学习刻苦、努力，成绩个个优良，而且文娱、体育生活也非常活跃。我们经常配合国家的政治形势，排演文艺节目，在学校

或附近的集市上，为当地群众表演。我们排演的“刘胡兰”“王秀兰”“黄河大合唱”等剧目，以现在的眼光看，水平也不低。我在这些节目中，只能当观众，最多扮演个配角，因为我缺乏文艺才能。但在体育方面，尽管我的年龄最小，个子不高，但却是一员跑、跳的高手。入学第一年我就代表胶东8县市，参加了山东省第一届运动会。我光着脚丫和城市那些穿钉子鞋的同学一起参加60米和100米跑，并都取得了决赛权。

学校还经常请劳动模范、军分区首长做报告。

同学们很团结，互相帮助，亲如手足。我是班上的团支部书记，又是学校的团总支委员，所以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老师和同学都很喜欢我，给我冠以“天真烂漫的小黑姑娘”的爱称。

后来，大部分同学都在一二年级参加军干校或受机要训离开了学校。1952年毕业时，只剩下我们几十名年龄小的，以及有妻室的大同学了。

艰苦的生活条件和浓厚的政治气氛，造就了我们这一代人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和不为艰险、坚忍不拔的毅力。当然，有时也要付出牺牲的。我的那位同窗好友王淑珉，刚踏入东海中学一周年，就被贫困和寒冷，夺去了她年仅16岁的生命。

那是1951年春节前，我们进入期末考试阶段，她的手脚都冻烂、化脓、感染，连续高烧。但她还是坚持考完了全部课程，然后拖着病体，经过三昼夜的跋涉才回到家。回家后三天就命归黄泉。她的死给我留下了无尽的遗憾和遐想：我常想，如果当时

我们那里通汽车就好了，如果有盘尼西林就好了，如果有现代人这样的自我保护意识就好了。归根结底，如果我们的祖国象今天这样富强就好了。

1952年暑假，为适应国家改学制的要求，我们提前半年毕业。这年胶东各县都成立了初级中学，文登专区成立了第一所高中（文登一中）和第一所中师（文登师范）。我们东海中学的同学，全部被保送入文登师范。文登师范的前身是文登乡师。文登乡师是一所有着革命传统的学校。谷牧副总理就是这所学校第一届学生，当时他还是这里地下党的支部书记。30年代末抗战爆发后，大部分学生都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学校停办了。所以我们这一届是解放后第一批学生。

学校继承了老乡师的光荣革命传统，再加上学生本身素质也比较好，所以学校很快就办成了全省一流学校。

当时我们的课程设置，是全面照搬“苏联老大哥”的，除了设置高中全部课程外，还增加教育学、心理学及书法等课程。

学校每天早操后，校长或教导主任要进行早训。内容包括时事形势、好人好事等。每周六，党团员要开生活检讨会，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大家都非常认真，不放过任何一点小毛病。彼此之间的批评既严肃又是善意的，所以不但不会伤害同学之间的感情，反而使同学间的关系更加亲密。大家都认为，谁能对自己提出批评，是对自己最大的爱护。

三年的中师生活是我一生第一个辉煌时期。我不但学习成绩门门优秀，而且体育成绩也达到了最高峰。我能在文登专区运动会上，取得 100 公尺、跳远、铅球和 4×100 公尺接力四项第一；在山东省中学生运动会上，多次获得奖牌，并打破了山东省中学生铅球记录；我还是文登专区第一任女子篮球队队长，多次代表专区参加山东省运动会，并取得了好成绩。所得的大奖状母亲一直挂在家里，引以为自豪。

为此，我连年被评为专区的三好学生，推选为出席山东省共青团代表大会及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一顶顶桂冠，不断向我这个年仅 18 岁的少年头上戴。。。。。

一位优秀的教育家，我的班主任杨锡华老师，在我的毕业留言簿上，这样写道：“你思想单纯，品德高尚；学校努力，成绩优良；锻炼刻苦，身体健壮；走起路来好象头发梢上都是力量。这些都是你使人敬佩、喜爱的地方。莫忘：你还很幼稚，经不起些许风霜。高兴了眉飞色舞。难过了，眼泪汪汪。几句听着顺耳的话，也往往为之失去主张。在人生旅程上，要沉着、冷静、大方，锻炼得格外坚强，报答党、人们对你的培养与期望。”

我牢记恩师的教导，中师毕业后，满怀激情，欲奔教育战线，做一名“华尔华拉式的优秀乡村女教师”。然而，又一次突如其来的机遇，落在了我的头上。我以三好学生的身份被推荐报考山东师范学院。当时我们学校共推荐了 11 名同学，我是唯一的女

生。我以优异的高考成绩，被录取到山东师范学院地理系本科。开始了一生的黄金时刻——大学生活。

大学生活

春光明媚的大学生活，是我前半生的黄金时代。

记得我们高考的作文题目是：“我准备怎样做一名高等学校的学生”。我按照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思路，描绘出我的大学生活蓝图。

入学后，我们班的同学来自福建、浙江、江苏、安徽、山东等地，每个人都出身和经历都不同。全班只有一名共产党员，几名共青团员，半数以上是普通群众，还有一名曾经是三青团员的同学生。其家庭出身，从剥削阶级到劳动人民无所不有。我生在老解放区，第一次接触这样复杂的情况，十分惊讶。但我是学院团委委员、系团总支副书记，兼任班团支部书记，有责任把这一班出身不同，思想境界和政治素质各异的同学，团结在一个大家庭中。这对于一个从小山村里走出来的我来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个别来自大城市，自幼又过着优裕生活的同学，对土里土气，穿着母亲做的土布衣、鞋，又操着一口标准胶东话多农村姑娘，从心里看不起，甚至公开嘲笑。而我对他们那种少爷、小姐作风更看不惯。这种无形的墙纸班里很快就“筑”成了。我们系党总支书记王士举和系主任侯春岑同志发现了这一苗头，及时耐心地对我和其他班干部进行帮助教育。使我很快意识到这是唯成分论和自我优越感在我和部分班干部身上作怪。于是我主动召开团支部

大会，在会上带头作了深刻检查，并提出了“一帮一，一对红”，“多看对方的优点，多找自身的不足”等口号。同时组织同学们进行军事野营，攀登千佛山比赛，请老前辈讲革命故事，以及各自讲述自己的童年趣事等活动，很快同学们之间的“距离”缩短了，那座无形的“墙”终于被大家一齐推倒了。班上的政治空气十分浓厚，团员纷纷提出入党申请，非团员则积极争取入团，就连那位曾参加过三青团的同学也提出了入团要求。系党总支书记表扬我是知错就改、雷厉风行的好带头人。同学们说我和王嘉芳（共产党员）同学是班上的“粘合剂”。

我们生活中这个“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朝气蓬勃的大家庭中，人人心情舒畅，个个积极向上，到毕业前夕，有五分之一的同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除个别同学外，都加入了共青团。在学习上你追我赶，谁也不甘落后，共同的目标是争当优等生，获副博士学位。

尽管诸多的社会活动和频繁的体育比赛占去了我不少时间，但我还是紧紧抓住了学生的任务是学习这个中心，比别的同学更刻苦，充分利用星期天和节假日，把平日耽误的时间补回来。四年大学生活我仅回家一次，还是因为父亲病重。这样我的学习成绩始终排在优等生的行列中。

美丽的大学校园，宽广的体育场地和齐全的体育设施，使我这个体育爱好者如鱼得水。每天早晨早起半小时，晚上晚睡半小时，无拘无束地奔跑在400米跑道上，活跃在球场上，驾驶着摩

托车奔驰在校园马路上。不久我就成为学院第一批国防体育运动员。我还是济南市大学联女子篮球队队长。由于我的弹跳力强，奔跑速度快，在高个如林的队友中，只有一米六的我，竟能成为全队的主力，屡屡为学校 and 济南市高等院校争得荣誉。人们都说我的篮球技艺可以和男子媲美。

1958年黄河发生了百年不遇的洪水灾害，而我是系里挑选出的十名突击队员之一，是全校百名突击队员中唯一的女生，扛沙袋、堵缺口，处处与男同学标着干。当战胜洪灾后，院刊头版上刊登着“防汛战线一女杰——李本川”一时间我成了校园内的新闻人物。此后不少男同学，每逢体力劳动时总爱和我比力气，如在千佛山植树时，班上挑出一位身强力壮的男同学和我比赛挑水爬山，看谁挑得重、跑得快，水不洒。结果以我的胜利而告终。

总支，就在这种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气氛中，很快就度过了两年的大学生活，进入实习期。1958年按照教学大纲规定，我们要进行教学实习。但当时正值反右斗争以后，政治气氛异常高涨，学校决定让我们到贫困的农村去，在贫下中农的指导下，完成为期半年的教学实习任务。于是，我们山东师范学院2000余名实习学生，浩浩荡荡开进了鲁西南各县，我带队赴菏泽专区的单县。

在出发前，院、系领导反复说明我们下乡的伟大意义。记得许用思院长曾这样教育我们：“这是一场教育大革命，你们是执行毛主席革命教育路线的开路先锋。下去后，只能成功，不许失

败。”我们的同学，一个个像打足了气的皮球，摩拳擦掌，都急于到农村广阔的天地里，做教育革命的开路先锋。

一切准备就绪后，1958年7月，我们自带行李，登上了津浦路南去的列车。在列车上，同学们像出了笼的小鸟，尽情地唱呀，笑呀。“年轻的人，火热的心，跟随毛泽东前进。。。。。”“火车在飞奔，车轮战歌唱，装载着木材和食粮，运来了地下的矿藏，多装快跑，快跑多装。。。。。”这些激励人心的歌曲，此起彼伏，不知不觉就到达兖州车站，各路大军，分道扬镳。我们改乘汽车，直奔单县。

那年夏季雨多，一望无际的鲁西南平原，被漫漫洪水淹没着，成为一片汪洋。高粱、苞米都泡在齐胸深的水里。高粱穗、苞米缨漂浮在水面上，像一群群海鸥，在海面上随着海浪上下颠簸。我第一次见到这种景象，真有点害怕。但没有多长时间，我们就驰过了“水乡”，汽车奔驰在绿色的原野上。又过了多长时间记不清了，我们就到达了单县。

单县城是一座古老的县城，城里牌坊很多。单县是黄河冲积平原的一部分，土质属粉沙质淤泥。雨天地面上十分泥泞，走在路上，就像跋涉淤泥质海滩一样，一不小心，鞋就要被拔在泥里。旱田则尘土飞扬，人们的头上、脸上、身上都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黄土。那里的房子是用泥土堆起来的，又矮又小。

我们的同学，大部分都来自华东、华中、华南等大城市，少数是本省胶东各县市。大家看到眼前的景象，都有点吃惊，但谁

也没想打“退堂鼓”，相反都争着到最艰苦的公社去。于是我就把大家分配到了各个公社。这个县只有一所中学——单县一中。按常规我们应到这里实习。但这次却要到各个没有中学的公社去，在当地贫下中农的协助下，自己办学。我们既要负责招生，又要负责学生的食宿，更要负责讲课及带学生参加农业劳动。也就是既要当校长，又要当教师，还要当炊事员。我们的同学们都非常卖力，牢牢地记住了校长的教导。不到一个月，各公社的农业中学就轰轰烈烈办起来了，规模最大的 300 余人。师生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我们得到了全面的锻炼。

我们班最小的曾思杰同学，因为他出身于民族资产阶级家庭，虽然在学校各方面都表现不错，团支部多次通过吸收他入团，但学校团委都未批准，理由是他出身不好，要经过长时间的考验。我是团支部书记，亲自作他的入团介绍人。这次我把他分配到了最艰苦的地方，他干得很出色，和当地学生、贫下中农相处得亲如一家。一次他只身一人从冰水里救出一名落水儿童，自己却全身都冻僵了，被贫下中农抬到家里，用体温给暖过来了。那位被救儿童的家长，一定要认他做儿子的干爸爸，把他羞得满脸通红，因为那年他刚满 20 岁。听说曾思杰同学在文革中被无辜逼死了。虽然他离开这个世界 30 多个年头了，但他那潇洒、英俊的体态，满脸稚气的容貌，至今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

我在单县的担子，比一般同学重得多。我既要完成办学任务，还要骑着一辆破自行车，每月在全县范围内转一圈，了解情况，然后向学校写出书面报告，并且还要自采、自编，自己刻蜡版、自己油印我们的刊物《红硕果》。每到一所学校，我都要给师生们做一场报告。报告的内容除上情下达外，更多的是鼓励学生，好好学习，现在上农业中学，将来上农业大学。因为那时我20岁出头，讲话有声有色，颇有鼓动性，深受师生们的欢迎。没料到，事隔40年，我们海洋所一位同志，在火车上巧遇山东师范大学的两位副教授，他俩自称是我的学生，把我在单县的传奇故事滔滔不绝地讲了许多。特别讲到，他们之所以有今天，是因为受了我当年演讲的鼓动，决心农业中学毕业后，上农业大学。后来为什么上来师范大学，也是受山师那批实习老师的影响，觉得能像他们那样做一名教师，是最高尚的职业。我听了同事的转达后，无比兴奋。没想到40年前，我的几场幼稚报告对那些童心，竟能产生如此巨大的感染力。从而我再次体会到教师的伟大，他能以自己灵魂中的烈火，去点燃千百万人灵魂中的火，我也为自己没走从教道路而遗憾。

农业中学办起不到三个月，大跃进、人民公社和大炼钢铁运动就席卷全国。学校停课，我们整天带领学生奋战在大跃进的风口浪尖上。在大炼钢铁、兴修水利、深翻土地、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各种活动中，我们的汗水洒遍了单县平原。

我参加过县直机关深翻土地和挖河劳动。县直机关在数百名干部中，挑出十名身体最强壮者，搞全县的小麦“卫星”田。我被选中了，而且又是惟一的女性。那个劳动强度，毫不夸张地说，是空前绝后的。

所谓搞“卫星”田，就是把一亩地，翻一丈深，下一万斤麦种，施几万斤底肥，达到亩产小麦十万斤的目标。县长要求我们在五天内完成这一艰巨任务。按正常情况，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但我们十个人除了一昼夜四餐饭外，没休息，没合眼。每个人的双手都磨破了，鲜血染红了镐头柄和独轮车把。我不止一次累得晕倒在地，汗水把衣服湿得连衣角都滴水。就用这热情、干劲和体能的极限死拼了五天五夜，按时完成了任务，我们十人都被评为“大跃进突击手”，并还发给我们每人一张奖状。但据说那一亩小麦后来颗粒未收。

还有一件使我终生难忘的事。那就是1958年底，县里召开万人大会，会上主持人响亮地提出两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会场两旁用大幅标语写着进入共产主义的标准。记得最清楚的有这样几条：1、家家户户住上新瓦房；2、每人每天一斤白面，一斤大米，一斤鱼，一斤肉，一斤牛奶，一斤鸡蛋，一斤蔬菜。。。。。。总共是十几斤；3、人人都穿上新制服，新皮鞋。在当时，我们餐餐都以胡萝卜为主食，看到纸上写着这些美味佳肴，不禁垂涎三尺。但冷静一想，这可能吗？一天十多斤食物，有多少人能吃下去？再说两年之内，到哪里去搞到那些鸡、猪、牛等牲畜？没

有牲畜，哪来的奶、肉、蛋？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对上级提出来的口号和目标产生怀疑。但怀疑也不敢说，如果说出来，说不定会被“拔白旗”。“白旗”和“右派”差不多，都是很可怕的。于是，我违心地跟着全县男女老少，欢呼跳跃。直到1959年彭德怀同志才代表全国亿万人民，说出来心里话。那叫“浮夸风”，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是假共产主义。

大跃进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但我们的工作一天比一天难做。各农业中学都几乎断了炊，我们不得不每天带着学生，到冻得绷绷硬的地里去复收胡萝卜、地瓜、花生等充饥。很快大家都成了“大胖子”，两条腿象灌了铅一样，全身乏力。

我把这些情况都如实向学校写了汇报。各县的情况都大同小异。学校派校医到各县，对同学的健康状况进行抽查。结果是，大家几乎都患了浮肿病，且有相当一部分人患了肝炎。于是，学校通知我们紧急返校。

返校前，我们和朝夕相处、亲如一家的各农业中学的老师及学生代表合影留念。那些天真可爱的学生，依依不舍，甚至痛哭流涕，紧紧抱着我们，死活不让我们离开他们。我们又何尝舍得丢下他们呢？在告别这些可爱的学生后，连夜顶风冒雪，自背行李，步行100余里，到达河南商丘火车站，登山了返校的列车，提前近一个月结束了我们的实习生活。

如今40多年过去了，每当拿起那张照片时，尽管上面那一张张孩童面孔，我一个也不认识了，但单县一望无际的黄河冲积

平原，热情好客的单县父老乡亲，及大跃进激动人心的场面，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终生难忘。那五个多月的生活，是我人生道路上重要的一段经历，像一篇长文中承上启下的段落。

1959年春节刚过，我们的大学生活进入生产实习阶段，此时适逢国家决定组织全国各有关部门，在苏联专家曾科维奇、萨莫依洛夫、里昂捷夫和聂威斯基等的指导下，开展对天津塘沽新港泥沙回淤问题的研究，并提出可行性的解决方案。我们山东师范学院的师生在王连第老师带领下，有我、李凡、陈珍皋、黄克仰、张义方五人参加由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负责组成的地质地貌调查队。我们这个队主要由海洋所，以及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厦门大学、华东师范学院、福建师范学院、南京水利科学研究所和我们山东师范学院等单位组成。总负责人是尤芳湖同志和现在的资深院士任美鄂，以及杨怀仁和陈吉余院士等，顾问是O.K里昂捷夫教授。

我基本参加了工作的全过程。特别荣幸的是，我和李成治、郭永盛等同志一起陪同O.K里昂捷夫教授，乘飞机在渤海湾上空观察沿岸地貌形态及黄河、海河等注入渤海的浑水线扩散范围，以便判断塘沽新港泥沙的来源。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坐飞机。也是我国最早一次利用飞机进行海岸地貌观察。我们的心情都非常激动。飞机飞得很低，地物都看得清清楚楚，连地上跑着的野兔都能看见。我们都认真地描述着观察到的海岸地貌形态，勾

画着浑水分布范围。李成治同志还拍下来许多照片，为这次调查研究工作，发挥了重大作用。

1959年7月，我以优异的学习成绩完成了大学学业。学校决定将我留校任教。我十分高兴，终于圆了我的教师梦，而且是做大学教师。正当我沉浸在无比欢乐之中时，再一次偶然机会降临在我的头上。山东省教育厅通知学校，让我和陈珍皋、李凡三人到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报到。开始学校没有通知我们，而是请求教育厅允许把我们三个人留校，另派三名同学去海洋所。教育厅的答复是：“首先要考虑国家利益，然后再考虑学校的利益。海洋所点名要他们三个人，所以他们必须到海洋所报到。”就这样我的教师梦彻底破灭了。

投身海洋科学事业

1959年8月13日我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来到了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一个普通师范院校的学生，能跨进国家最高研究机构，这是我做梦都没想到的。从此我在海洋研究所工作了40个年头。

40年来我从事过科研工作、干过团委书记、党支部书记、技术档案室负责人、研究室副主任、编辑部主任。我是个研究员，但不是一个名符其实的海洋学家；我曾是基层党、政负责人，但却不是名副其实的机关干部；我干过20余年的编辑工作，但又不是个优秀编辑。回顾我大半生的经历，我究竟是个什么角色呢？一句话，我是一个随时听从党调遣的共产党员！

跨进海洋研究所的大门后，我们深感自己在学业上“先天不足”。我们就加倍学习。向老专家学，向书本学，向海洋所的每一位同志学习。那时我们见了谁都称老师，就连莱阳路 25 号的门卫魏大爷我们也称他老师，至今一些老同志还以此作笑料。节假日，当同志们都外出游园、遛街或是与家人欢聚时，我们则坐在办公室里读俄语、学习海洋学基本知识。我们的拼搏好学精神，不只一次得到所领导的表扬。记得 1960 年仲秋之夜，正当我们背俄语单词起劲的时候，我们的党委副书记兼副所长王斌同志走了进来。他关怀备至地拍着我的肩膀说：“今晚你们都不要学习了，到我家过节。”我们哪好意思跟他去，搞得他不得不回家给我们每人拿来一个月饼和两个苹果，与我们一起在办公室过节。还给我们讲他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参加朝鲜板门店谈判的故事。我们既受到了爱国主义教育，又解除了佳节思亲之苦，那时的领导就是这样关心自己的部下。

从 1959 年开始，直到 1963 年，我先后担任苏北——长江口；黄河口——莱州湾两个淤泥质海岸研究课题负责人。我们完成了北自滦河口，南至象山港淤泥质海岸调查。获得了我国首批淤泥质海岸调查资料。撰写出 40 余万字的专题调查报告，为解决我国淤泥质海岸冲淤规律，提供了第一批材料。

那时虽然我是一名刚跨出校门的学生，但所领导对我非常信任，让我担任“苏北——长江口淤泥质海岸调查研究”课题的负

责人之一。在众多德才兼备的老同志面前，我自叹弗如。但既然有领导的信任，我就勇敢地挑起了这副重担。

1958年我国开始炮击金门以后，到沿海地区工作的人员，政治上审查非常严格。去海岸带调查的队员名单，需经解放军总参谋部批准后，再到各地驻军和地方有关部门办理通行证。因为我出身好，又是共产党员，所以领导就派我去完成这项任务。记得当时我头扎两条短辫，穿着一套合体的海军棉制服，脚踏浅咖啡色反毛登山鞋，显得很精神。当我到达总参谋部时，作战处的一位首长看完我的介绍信，上下打量我一番后，和颜悦色地操着胶东口音问我：“你就是李本川？”“是！”，“你这么年轻就是共产党员？”“我24岁了，四年前就入了党！”。他听完我的口音也是胶东人，显得格外亲切。迅速为我办完了审批手续。我拿着总参的介绍信心情万分激动，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到这样的大机关，办这样的大事。我向首长深深地鞠了一个躬，转身就要走，但又被他叫住了。他问我住在哪个招待所，我说我要立即赶到济南、上海、杭州等地办通行证，不能住下，同志们还在家等我出发呢！他听后立即派了一辆吉普车把我送到了北京火车站。就这样我马不停蹄地直奔济南、上海、杭州。白天办事，晚上在车站候车室或火车上坐着睡觉，没住一次旅馆或招待所，很快就办完了全部手续。当我回到所里时，领导和同志们都惊呆了，谁也不相信我会在这么短时间内跑完那么多单位办好了一切手续。

若干年后，我的同事还赞叹说，那是我们第一次领教你办事的效率。

1960年3月份，我和郭永盛同志带领十名身强力壮的男同志，背上了调查仪器及简单行李，从青岛出发，开始了苏北——长江口海岸动力地貌调查。我们日行百里，还要在淤泥滩上观测地质剖面，经常是深夜十一二点才能回到宿营地。苏北的淤泥滩，有其独特之处，其表面有一层10-20毫米的粉砂层，当地人称其为铁板沙，下面就是几米甚至几十米的淤泥。一般情况下，走在铁板沙上，比较安全。一踏破铁板沙，其后果就很难设想。据当地渔民讲，曾经有一支解放军测量队的两位同志，就是因为踏破了铁板沙，而陷入深深的淤泥中，牺牲了。在一次做水准仪滩面测量时，我的一条腿突然深陷于淤泥中，正当我企图用力拔出时，另一条腿也陷了下去。我极度紧张，只感到身体一点一点向下沉，不多时就沉到大腿根了。我心里暗想，这次是定死无疑了，因为谁也不能来挽救我，谁过来，不但救不了我，而且他也要陷下去。但急中生智，减轻单位面积承压力大物理学定理，在我脑海中突然浮现。于是我迅速躺到这淤泥滩上，使劲我的全身力气，连滚带爬，终于爬出来“陷阱”。全身被灰黑色淤泥包裹着，只露出一双发亮的眼睛，和一口雪白的牙齿。那种滑稽狼狈相，使队友们惊喜不已。我的队友还为我拍下来这个具有纪念意义的镜头。

在苏北——长江口工作期间，最艰险的莫过于浅海水文同步观测工作。为了取得浅海（20米等深线以内）水文资料，我们

在工作区域内，设了十几条水文剖面。租用五条渔船，每条船上安排两个同志，在所设剖面上进行 24 小时连续观测。观测项目有水温、流速、流向、风速、风向、水深，底质取样等十几项。东海风浪很大，只有几十马力的小渔船，在浩瀚的大海上，任凭风浪摆布，有时船体倾斜达 30 度，把我们折腾得呕吐不止，开始吐饭，继而吐碧绿的水，最后是吐血、吐蛔虫。每次在海上工作半个月，几乎没有直立行走，全身爬行着完成各项观测任务的。但从来没有因为晕船而耽误一次观测。

有一次，正当我趴在船沿上采水样时，一个涌浪把我推入海中。使我离开小渔船 20 多米远，我奋力挣扎着向小船上爬。尽管我的游泳技术不错，但怎么也爬不上船，刚靠近船体，涌浪又把我推出 20 多米。这样推来推去不知有多少次，把我折腾得精疲力竭。我想，这次我大概要葬身鱼腹了。正当危急之时，我们的船老大急中生智，用绳子绑住橹的一头，然后将橹抛入海中，我紧紧抓住了橹，就这样船老大把我拖上了船。这使我第一次体会到人们常说的在水中抓住“救命稻草”的真正含义。

那时在海岸带工作，每天只有三角钱的补助费。但由于工作繁重，再加上我们都是 20 岁左右的年轻人，饭量大，每月 53 元的工资，几乎都吃了，这给每位同志都造成很大的经济困难，但谁也没有怨言，大家同心同德，按时完成了任务，受到所领导的表扬，我也被评为所里的先进工作者。

野外工作结束后，我们就进入实验室做沉积物的矿物鉴定，以及沉积物颗粒的粒径分析工作。因分析仪器有限，我们就采取“歌人不歇马”的办法，充分利用仅有的实验室设备，分两班昼夜不停地连续工作。那时我的精力十分旺盛，又是课题负责人之一，所以经常是连续几昼夜不停地工作。每天深夜12点伙房管理员黄梦周同志风雨无阻，准时给我们送来夜餐。从福山支路食堂到莱阳路25号实验室，大约有二里路，他提着两大桶面条，累得气喘吁吁，但总是乐呵呵的，操着苏北人特有的大嗓门，老远就喊：“同志们辛苦了，开饭啦！”，我们也都笑着迎上去：“С п а е и о о т о в а р и щ а м Х ч а н !”（谢谢老黄）。他分给我们每人一碗面条，就又到其他实验室送饭去了。那时的人就是这样，不计报酬，不知疲劳，高高兴兴地工作着。

课题的最后一环是编写报告。这是体现科研水平的最重要一环。一般都由课题成员中水平最高的老同志执笔。然而经过半年多超负荷的工作，使得课题组的业务骨干：蔡爱智同志患急性关节炎，李成治同志患肝炎，都住进了医院，海洋学院的张利丰老师也返校了。这副重担势必压在了我和郭永盛同志肩上。面对一大堆野外调查和室内分析资料，我脑子乱成了一团麻，怎么也理不出头绪来。我吃不香，睡不着，整天在资料堆里翻来翻去。写出一部分，自己不满意就撕掉，就这样写写撕撕、撕撕写写不知反复了多少次。海洋学院参加协作的江乃萼老师心痛地说：“像你这个年龄的人，都是无忧无虑地在老同志指导下做着具体工作，

而你却过早地挑起了工作重担，真难为你了。”听了她的话，不知为什么我竟落下来眼泪。当时流传着这样一个顺口溜：“上游流汗，下游难看，中游最合算”。我想，是不是我太注重争上游了？因此才陷入力不从心的地步。经过一段痛苦的磨炼后，我终于静下心来，认真分析资料，查阅参考书，请教尤芳湖、李成治等有经验的老同志。最后圆满完成了“苏北——长江口海岸动力地貌调查报告”编写过程的组织工作及海岸地貌部分的执笔编写工作。由于这项工作是在苏联著名海岸动力地貌专家里昂捷夫教授的先进理论指导下进行的，又采用了苏式振动活塞采样器采浅层样品，调查分析手段都比较先进，所以写出的调查报告水平就比较高。根据报告的有关章节，我和李成治、杨治家同志撰写并发表在《海洋与湖沼》上的《苏北暗沙的成因》和发表在《海洋科学集刊》上的《苏北——长江口海岸动力地貌特征》两篇论文，在我国首次论述了苏北暗沙的成因和沿岸泥沙运动的规律。几十年来一直被国内外学者广泛引用。

走出校门完成了第一个研究课题后，正当我满腔热情，准备接受新的任务时，却接到了两家父母和徐海伦的来信，催我结婚。我本想“先立业后成家”，面对现实，考虑到我们已经不年轻了，海伦也工作四年多了，于是我就答应了他们的要求。

我和徐海伦 1952 年相识，恋爱十年，到 1961 年春节才结婚。正值三年困难时期，由于天灾人祸，全国人民都在挨饿。我俩的结合没有一点物质基础，纯粹是两颗赤诚之心的结合。

我们那个时代的人婚礼和蜜月的简朴，是今天青年人所难以置信的。

我参加工作后弟妹还在上学，父母是普通农民。我每月53元工资要寄出一大半赡养父母及供弟妹上学。海伦兄妹四人，他也是老大，每月也要把工资的一半寄回家给父母还债及供弟妹上学。那时的人，对家庭、父母、弟妹大都是这样。

我俩结婚时，没要两家父母一针一线，只去领取了结婚证书，就算结婚了。那时的结婚证书，用的纸都是黑乎乎的，十分粗燥。凭证书，供应链两斤黑不溜秋的地瓜糖，分给朋友、同事每人两块。同事们集体凑钱买了两本小影集送给我们，这是我们收到的惟一结婚礼物。那时买脸盆、暖瓶都需要票证，连我们结婚都没发一张，同事们更无处搞到，只好买影集送我们，在当时这是很珍贵的礼物了。

供应链六尺人造棉布，我做了一件花棉衣，作为新婚礼服。下身穿一件褪色的蓝布裤子，一双旧胶鞋，这就是我做新娘的全部装扮。海伦是第一次来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处于虚荣心，我多么盼望他作为新郎，能穿得整洁美观，潇洒地出现在我的同事面前。可是，他来时装一套褪了色的中山装，裤子上还带着补丁。看着他这身打扮，我说不出内心是一种什么滋味，眼泪夺眶而出。我问他为什么不穿好一点的衣服，他说，这是最好的一身了。

知我者，莫过于他。他拿出手绢替我擦泪，像对待小妹妹一样摸着我的头说：“你一向很坚强，为什么为这点小事就掉泪？结婚是人的结合，是两颗赤诚的心的结合，又不是物质的结合。”他短短的几句落地有声的话，一下解开了我心头的疙瘩，立刻破涕为笑。

新婚之夜，我们地质室二组的同事，一起围坐在办公室火炉旁，喝着白开水，品尝着那两块喜糖，谈天说地，听我们讲长达十年的恋爱经过。大家为我们真诚相爱所感动，都祝贺我们新婚大喜，永远幸福。晚上十点，同事们帮我们把四张办公桌对在一起，把我的被褥从宿舍搬来，这就是我们的新房——青岛莱阳路33号地质室二组办公室。在这特殊的年代，特殊的地方，度过了我们的新婚之夜。

婚后第二天，我们回家看望双方父母及弟妹。结婚只有三天假，加上春节共一周时间。我们先乘船到石岛，下船后顶着刺骨的西北风，步行一昼夜，行程160里，到达海伦家。到家后，我还没看清公婆及小叔、小姑的面孔，倒下就睡着了。听说村里许多人来看新媳妇，我却全然不知道。许多年后我回家时，乡亲们还打趣说：“当时我们只看到了睡着了的新媳妇。”

这天是除夕，婆婆把我叫起来吃年夜饭。一盆热腾腾的水饺端到炕上，疲劳饥饿的我们，看到这久违的美食，立刻狼吞虎咽地吃起来，片刻就吃光了。这时，我才发现，婆婆他老人家在灶

旁用饺子汤泡花生壳团子吃。我心里好内疚啊，眼泪默默地流下来。因为除夕夜婆婆没吃上饺子，我和海伦遗憾终生。

吃过年夜饭，海伦领我到本家大嫂家睡觉，因为海伦家的炕，在大跃进年代都拆做肥料用了，只剩下一铺炕，一家五口人挤在一起，再容纳不下我们两人了。

大哥大嫂已年过六旬，还伺候着两位年过八旬的老母亲和大妈。大哥、大嫂十分善良、孝顺。大哥在抗日战争时期曾任过区长，因掩护我地下工作者，遭日本鬼子毒打，大嫂由于惊吓，落下妇女病，终生无子女。

本是新婚蜜月，然而不幸的事偏偏在这天夜里发生了，我们刚躺下，就听到大妈急促的呼噜声，大嫂点起小油灯，我们也爬了起来，围坐在大妈身旁，她艰难地呼吸着，脸憋得发紫，我们眼睁睁地看着大妈停止了呼吸。我和大嫂一起给大妈擦洗身体、穿衣服，天亮后与乡亲们一起安葬了大妈。这个除夕夜，我们连眼都没合。

正月初二到了我的家。我们家的生活要比海伦家好些。邻居们送来了赶海挖的蛤蜊、蛏子、海蛎子，母亲杀了自己喂的两只鸡，大盘大碗地做了六个菜，全家人及亲朋好友 20 余人聚在一起，美美地吃了一顿，这就算我们的婚宴吧。在我们家只住一夜，就登上了“鲁民 102 号”船返回青岛。

当我到人事科销假时，科长惊奇地问：“你的假期还不到吧？”我说为了赶船期，提前一天回来了，如果乘下班船，就要耽误两天。张科长感慨地说：“你真是个遵守纪律的好同志啊。”

我们的结婚和蜜月，两人在一起仅六天时间，我送走了海伦后又投入了黄河口——莱州湾淤泥质海岸的调查工作。

黄河口——莱州湾的淤泥质海岸，又是另一种类型。淤泥滩上有30公分以上淤泥覆盖在表层。人们脚踏上去就要陷到膝盖深，每走一步都很困难。黄河口地区的自然条件十分恶劣，海滨是一望无际的芦苇丛，高潮线以下是一片淤泥滩。我们既要穿越芦苇丛，又要跋涉淤泥滩，还要与饥饿作斗争。因为1961年是我国最困难时期。我们野外队的粮食定量，也从45斤减到36斤。粮食不够吃，我们就拔盐蒿、野绿豆等充饥。我们大部分时间住在海边渔民临时搭的窝棚里。

不到一个月，我们队里年龄最小的王厚堂同志就倒下了。记得那天晚上九名男同志住在海边窝棚里，我住在离他们约五六里的渔村里。深夜我忽然听到急促的敲门声，开门一看，原来是我们的两位队员来找我，说是有急事要报告。我迷迷糊糊地跟着他们到了海滨窝棚，在昏暗的小油灯下，我看到小王躺地铺上，脸上苍白，身上和地上一片血迹。此情此景，使我一下子晕倒在地，许久不醒人事。当我醒来时，我的脸上、手上、脚上、腿上都扎上了银针。这是队友们请来的赤脚医生给我扎的。医生说我有心脏病。那时我根本不相信医生的话，因我自幼就有“晕血”

的毛病，从来不敢看杀鸡、杀猪，看到血就要晕倒。十几年后，事实证明，当时赤脚医生的诊断是正确的。我醒来第一件事就是派高良和崔洛斌两位同志，到周村解放军医院求救。那时没有其他交通工具，只凭两只铁脚板和火热的阶级感情。他们俩手持钉锤，穿越芦苇丛，披星戴月，在黎明前步行六七十里，到达周村医院。亲人解放军的急救车，急速驰来，我们把小王抬到了车上，车还没开动，小王又大口大口吐血。。。。。

小王离队后，一去就再没返回。听说吐血被军队医院治好了，但不久又患了麻疹，久治无效，终于与世长辞了，年仅 21 岁。小王的去世，使我们十分悲痛，他是一名好同志。至今，虽然四十年过去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仍然留在我的脑海。我永远不会忘掉他对我国淤泥质海岸调查所做出的贡献。与小王一起进所的同龄人，几乎全部晋升为高级工程师，而我们的王厚堂同志却什么职称也没有，永远安息在九泉之下。海洋所甚至没有几个人还记得他的名字。

由于我在最困难的条件下，再一次带领课题组胜利完成了任务，所以我连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同志们则给我冠以“女强人”的美称。当然这都是过奖。但是，在我国成千公里淤泥质海岸线上，确实留下来我深深的脚印。。。。。

完成了两个淤泥质海岸调查研究课题后，我又参加了山东半岛基岩海岸调查。

1963年，所里根据科学院“加强科技档案工作”的指示，把我从科研第一线调到第二线负责扩建科技档案资料室。记得1963年初，一个星期六晚上，党委办公室主任黄树德同志参加我们地质室党支部组织生活会。在会上他说科学院来文件说，要加强科技档案工作，各单位都要抽调得力的科技干部负责组建档案室，并问我愿不愿干。当时我正满腔热情地从事海岸动力地貌研究工作，决心做一名红色海岸动力地貌专家。这一突如其来的问话，使我措手不及。我说考虑一下吧！此后的一周内我陷入极度的矛盾之中。去吧，我的专家梦就要破灭。不去吧，共产党员哪有不服从党调遣的道理。那时我拼命学习毛主席著作，企图从中找到答案，果然有效。当我反复阅读了“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三篇文章后，被张思德、白求恩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所感动。我认识到：搞科学研究，当科学家是为人民服务。既然都是为人民服务，那就让党安排就是了。想到这里，我的思想豁然开朗，挥笔写了一篇《学习老三篇解决自己的思想问题》的文章，发表在《青岛日报》上。于是我就愉快地到档案室上任了。

在我去之前王仲文、王俊卿两位从部队转业的同志已先到了档案室。我们三名共产党员，在所领导的大力支持下，雷厉风行地干了起来。首先我们搬了家，然后购置了新设备，并建立健全了各项规章制度。根据工作需要又从研究室调来了李健博、于振娟及管叙堂同志。我们六人中有四名共产党员，两名共青团员。

大家同心同德，很快就把建所十几年来所完成的研究课题，都归类档。还响应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号召，苦练基本功。我们从实战要求出发，创造了“三快三勤”的工作方法。能从没有阳光和灯光，漆黑的档案室里，在一分钟内准确无误地从七百余卷档案和两千余份内部资料中，取出所需要的档案或资料，因此我们所的档案室被评为中国科学院和青岛市的先进档案室，来参观的单位络绎不绝。

1964年初，梁毓哲副书记调入我们海洋所，所党委召开各部门负责人汇报工作。大家都认真做了书面准备，而我无论做报告或进行汇报，从不写讲稿，只是打个腹稿就行。当轮到我汇报时，我侃侃而谈，有声有色地把我们的工作汇报得头头是道。使得梁毓哲同志大为震惊，他悄悄问坐在他身旁的孙自平书记，“这个女孩子叫什么名字？”“李本川。”尽管他们的声音不大，但我还是听得清清楚楚。会议刚结束，梁毓哲同志就对我说：“李本川同志，你的汇报很好，你领我到档案室去看看吧？”我想大概这位新领导不相信我所说的，那么你就亲自去看看吧。我高兴兴带他到了档案室，当场我们每个人都给他进行了实战拿档案表演。他还认真审阅了我们的各项规章制度，翻阅了档案与资料卡片，抽查了档案，并面带笑容地看了我们获得的奖状，然后和我们进行了亲切的交谈。最后高度赞扬了我们的工作，从此“李本川”的名字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64年我和王仲文同志都被提拔为科级干部，当时海洋所有888名在职人员，只有28名科级以上干部，而我俩是海洋所最年轻的科级干部。不久我又被提拔为所团委书记，领导全所近500名青年学雷锋，做好事；学毛主席著作，提高政治思想觉悟。同时，为了活跃青年的文娱生活，我和董金海同志还组织青年自编自演发生在我们身边值得颂扬的事情。记得周百成和高月华同志以杨肇慧（原名王爱慧）同志的苦难经历为题材，编写出四幕话剧《忆苦思甜》，由徐贤懿、杨惠敏、贾汝勇、苟淑名、史铮等同志主演，高月华、吴光宗同志执导。表演水平可与青岛市话剧团媲美，曾多次被市委宣传部调去为越南、朝鲜等国外宾表演，并获青岛市团市委颁发的编剧奖、组织奖、导演奖、表演奖等多项奖励。

文革剥夺了我的工作权利。后我又回到了科研第一线，完成了几个研究课题。接着又组织创办了《海洋科学》。我在海洋所基本做到了干一行，爱一行，而且不遗余力地去干，因此也取得了一定成绩。

文革

正当我在工作与生活道路上顺利前进的时候，那场“史无前例”的大动荡突然袭来，它改变了我的人生旅程。我对这次大革命的历史背景及其要达到的目的一无所知。像我这种人，从来不会去考虑这些问题，一向是党指向哪里，我就奔向哪里。然而这次我竟搞不清究竟党要向何处指，只凭自己朴素的阶级感情和历

次运动的经验行事，结果糊里糊涂成了革命的对象，还差点断送了年轻的生命。

运动开始时，我一如既往，按党的要求积极投入运动。查资料、看报纸、写大字报批判“三家村黑店”、“海瑞罢官”。我感觉这场运动离我们十分遥远，写写大字报就过去了，让文艺界去争论吧。

然而，事情完全不像我想象的那么简单，“风暴”一步步向我们逼近。1966年6月26日那天，在我们毫无觉察的情况下，礼堂里竟挤满了人，把以毛汉礼为代表的36位老科学家和有点这样或那样错误的同志揪到台上批斗。我们认为科学家是我们国家的宝贵财富，党对高级知识分子是有政策的，不能乱批、乱斗。我们遵照党委的指示连夜给市委宣传部写了一份简报，向市委反映这一违反党的方针政策的情况。简报写好后却交不出去，因为负责我们海洋所的市委宣传部部长董海山同志不知被揪到何处挨斗去了。不久，我们这个“官办文革办公室”被封闭。我们都卷入大辩论之中，虽然在组织上没形成两派，但在言论、行动上两大阵营非常鲜明。围绕着党委书记孙自平、副书记梁毓哲同志，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是革命领导干部，辩论达三四个月之久。我和政治部、团委及绝大部分党、团员，不约而同地站在所谓“老保”一方。我们坚信孙自平、梁毓哲同志是革命领导干部，有缺点、有错误应该抱着善意的态度进行揭发批判，而

不应该一棍子打死。另一些同志则认为他们是死不悔改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必须打到。

那时有政治斗争经验的老同志，不管支持哪一派都在幕后，不肯公开自己的观点。只有像我这样一批初生“牛犊”，天不怕，地不怕，坚信自己是紧跟毛主席的，是正确的。所以我从一开始就旗帜鲜明、观点明朗地投入了运动中去。那时有的船员同志给我统计，一天上台 36 次为孙、梁辩护。辩论没有结果，两派又出现了 168 比 168 的大字报对阵。即：168 人造大字报上签名打倒孙自平、梁毓哲，并组成了“罢官团”到山东省委和科学院要求罢他们的官。同时出现了 168 人签名的反对大字报，也组成了“反罢官团”到省委和科学院反罢官。

尽管全国的政治形势对造反派十分有利，但因他们找不出打倒孙自平、梁毓哲的确凿证据，所以两派很长一段时间处于“相持”状态。后来两派公开拉起来队伍，“红海洋革命造反团”和“前卫战斗大队”同时诞生。那时中层以上领导干部，没有人敢公开参加什么组织，只有我义无反顾地参加了保守组织“前卫战斗大队”。当时我们这批人，对“造反”两字非常反感，所以我们的组织坚决不打造反的旗号。形势对我们越来越不利，但造反派对我们这批出身好，平日表现也都不错，既没有辫子也没有尾巴可揪到保守派也无可奈何。

到了 1966 年十一二月份，刮起了一股所谓查抄黑材料的风，海洋所也没幸免，造反派一天数次到我家查抄黑材料，并让写出

数以百计的保证书，保证我没有黑材料。对我们文革办公室的其他三人也照样进行追查。其中一位出身不好的同志坚持不住了，向造反派坦白交待了那份简报。这一下“红海洋”造反团可搞到了一颗重磅炸弹，一下子炸开了海洋所运动的“新局面”。从此，我被开除了党籍、罢了官，戴上了“钢杆保皇分子”的高帽子，挂着“打到李本川”的黑牌子游街示众、劳动改造，数十次被抄家，白天晚上被揪斗，被剥夺了一切政治权力。

罢官、劳动改造、游街、抄家对我的打击还不算大，最致我于死地的是“开除党籍”，那是我的政治生命啊！我在党的怀抱中生活了十多年，无故使我离开了她，我无法接受这一现实。记得当时全所人员在礼堂开大会，举手通过了开除我和李金岭、李云阳三人的党籍，并勒令党委和政治部在半小时内通过开除我们党籍的决议。我嚎啕大哭为我们三人申辩，党委成员和政治部的大部分同志硬是不肯举手，时间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最后在极大的压力下糊里糊涂通过了。我被这一棍子打蒙了，从此整天以泪洗面，像是失去了母亲的孩子。每逢发工资，总是含着眼泪，找出最新的三角钱悄悄地锁在抽屉里，作为我的党费。心想尽管他们把我开除了，但我却永远不能开除自己，为“共产主义”献身的决心永不变。1969年我去找首席军代表，要求恢复我的党籍。却又遭到了非议，有人说我想翻案，我很清楚我没有案可翻，这是我的权利。经过多次交涉，军代表才同意收下了我的党费。我捏着已长了毛的九元九角（33个月）党费激动的眼泪哗哗地流

个不停，我感到我又回到了母亲的怀抱。我把这一喜讯迅速告诉了与我同样命运的其他同志，他们也都补交了党费，而且十分感激我，是我的勇气和斗争精神，为他们解除了精神上的枷锁。

“前卫战斗大队”被冲垮之后，其中一部分同志与我一起挨斗、劳动改造。孙自平、梁毓哲同志则被关进了牛棚，再也没有人在公开场合替他们辩护了。海洋所变成了造反派的一统天下。

在那受折磨的日子里，我既感到了委屈，又感到内疚。委屈的是我并没有错，为什么一棍子就把我“打到”了。内疚的是因为我，导致一个好端端的“前卫战斗大队”垮台了，我对不起我的战友。基于这种复杂心情我开始给党中央、毛主席写信，为自己及一批受迫害的同志申诉。我坚信我和他们都不是反革命，但我的一封封信却石沉大海。有一天我又在伏案写信，与我一起挨斗和劳动改造的人事处处长曲超同志悄悄对我说：“你太年轻了，有些事你还不懂，一切都要到运动后期解决，不要再写信了。”我对她很尊敬，听了她的话以后，不再写信了，而且积极参加“劳动改造”。因我身强力壮，在劳动中比其他同志干得都猛：如在托儿所洗床单时，林美华、邹少颐等同志一天洗二十床，我则洗三四十床；盖仓库挖地基劳动时，曲超等同志挖一立方米，我能挖二立方米。虽然每天都累得汗流浹背，有时晚上上不了床，但心里觉得踏实，因为我是在做着对人民、对社会有益的事情。我还利用劳动之余，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写了大量的读书笔记，对毛主席的那本红色语录从头到尾背得滚瓜烂熟，至今有不少篇

章我还能背出来。通过学习提高了对事物的辨别能力。这大概就是事物的两重性吧，有失必有得。

直到“九大”以后，我才与“走资派”梁毓哲同志一起获得了“解放”。那时我们敬仰的老书记孙自平同志已含冤九泉之下了，年仅40出头的梁毓哲副书记也被折磨得重病缠身。根据解决山东问题十条的精神，经过全所同志三上三下的讨论，最后我和张连存、李培泉、刘廷均四人以革命干部和保守派代表的身份结合进了革命委员会，从此打破了清一色造反派掌权的局面。进入革委会后，实际上我们并没发挥什么作用，因为我们四人仅占革委会成员的四分之一，我们的意见不可能被多数人接受。到了批林批孔时，革委会内部的矛盾又尖锐起来。那时对批林批孔的背景尽管我不太清楚，但从心里反感，于是我就和我们支委会的同志一起（我当时是海洋所一连的副指导员，兼党支部副书记）抓生产，抓军工任务，很少参加革委会的会议。有一次革委会主任通知我必须到会。原来这次会议是把被清除的两名革委会成员又召了回来，而且会议的矛头还是对着已解放了的所级领导。我一气之下，宣布退出革委会，接着其他三位同志也都退出了革委会。这样就激怒了部分造反派的同志，于是大字报又向我铺天盖地投来。什么“以生产压革命”啊，“破坏新生事物——革命委员会的罪魁祸首”啊，“老保恶习不改”呀等等。对此我泰然处之，因为我饱尝了被剥夺工作权利的滋味之后，非常珍惜重新工作的机会。而且大部分同志包括造反派的大部分同志，对“整人”

已十分厌倦，人心思定，人心向往科研工作，所以我们支部一班人团结全连同志，紧抓科研工作不放松，完成多项科研、生产和军工任务。

通过这场大动荡，彻底扭转了我的人生旅程，我不再像以前那样，百依百顺地做驯服工具了，我开始思考我下半生的道路应该怎样走。我本想重返科研第一线，从事海岸动力地貌研究工作。然而经过十年浩劫的折腾，我的健康状况日渐不佳，而且已年过四旬，再像以前那样出海、出野外是力不从心了。正当我举棋不定时，组织调我到情报组（当时各处、室都叫组）——包括现在的各编辑部、情报组和技术档案室——做负责人。

我欣然接受了组织的安排，因为搞档案我是熟路，编辑工作与研究工作关系也比较密切。下面主要谈谈我为《海洋科学》这本刊物所付出的心血。

创办《海洋科学》

我做梦也没有想到，眼前这本小小的蓝色刊物，耗去了我生命旅程中最成熟、最有价值的时光！伴我走完了退休前最后十几年充满了信心和幸福的艰难路程。我为这本《海洋科学》的诞生、成长和发展付出了我剩下的全部心血和汗水，至今我仍对它恋恋不舍。。。。。

1998年《海洋科学》创刊22个年头了。22年来，它以“报道迅速、信息量大、实用性强”而著称，深受国内外读者欢迎。它多次荣获中国科学院和山东省优秀期刊奖，并一直获中国科学

院优秀期刊出版基金。近几年来，它又被列入国家自然科学核心期刊，进入 500 强中的前列。

然而在这些荣誉中，饱含着我们创业者多少辛、酸、苦、辣，却鲜为人知。

那是 1976 年打到“四人帮”以后，此时科学园地百废待兴，人们积聚了整整十年的劲，亟待发挥。受海洋所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和革命委员会的委托，我参加组织恢复停长达十年之久的《海洋与湖沼》，又克服了种种困难创办了《海洋科学》这本期刊。

要不要创办一个新的刊物，当时从所领导到情报室的每位同志，意见分歧很大。结合在革命委员会中德高望重的老科学家曾呈奎教授和情报室的大部分同志支持我的提议，一部分同志则坚决反对。双方各持己见，互不相让。于是我就把所内各研究室一批年轻有为的同志及学术上有成就有见地的中、老年科学家召集在一起，就要不要创办一个新的刊物，展开了热烈讨论。最后大家基本取得了一致意见，同意办一个新刊物为中、青年科技工作者提供一个进行学术交流的园地。

所内通过后，还要呈报科学院、国家科委等主管部门批准。层层审批，手续十分繁杂。为此，我们频繁穿梭于北京——青岛之间。三个多月时间内，我就往返北京——青岛达八次之多。我们跑遍了国家科委、科学院有关部门及北京各大出版社、印刷厂、邮电局等单位，真可谓跑破了鞋底，磨破了嘴皮。那时乘火车，不但买不到卧铺票，有时就连一张座票都没有，经常是从青岛站

到潍坊或济南才能找到一个座位。车厢里挤得水泄不通，要上厕所或喝点水都十分困难，有一次我竟被车厢内污浊的空气闷得晕倒在地。

经过三个多月的紧张工作，一切手续都办好了，一个老、中、青相结合的编辑委员会和一个朝气蓬勃的由四个年轻人组成的编辑部也诞生了。首任主编是曾呈奎教授，首任责任编辑是吕文超同志，我负责政治把关和部分编辑工作，张树荣同志负责组稿，周海鸥同志负责美术编辑。我们四人分工协作，废寝忘食，日夜忙碌着。办公室那个露出稻草的破沙发，是历史的见证。饿了就啃几口“杠子头火烧”，累了就在那上面闭一会眼睛。周海鸥同志干脆就睡在办公室里。

为了写好首期《海洋科学》的前言，我和吕文超同志征求各方面的意见，修改达数十次。当我们觉得满意后，我拿着底稿诚恳地去征求一位老编辑的意见，想不到迎面给我泼来一盆冷水，他说：“我看不懂，也不想看。”碰了钉子后，我既不怨恨人家，也没有灰心，相反更增加了我写好前言的决心。回到家里后，我又让丈夫给我们提意见，请他帮助修改。丈夫看后笑了，说：“科学刊物上不应该出现过多的华丽辞藻。”哦！我恍然大悟了，原来我们用在华丽辞藻上的功夫太多，怪不得人家说“看不懂”。于是我和丈夫一起进行修改，一遍又一遍，直到我们感到满意为止。第二天我又和吕文超同志推敲了一阵后，就送给革委会副主

任陈吉士同志审批，陈主任满腔热情地支持了我们，到此这篇前言才算完成了。

为了使《海洋科学》尽快问世，我和编辑部的同志轮流下车间帮助工人师傅搬铅字版、改版、打样、毛校，一干就是一个月。北京的三伏天闷热难当。印刷车间机器轰鸣，气温高达 30℃ 以上，我们不停地搬动 40 斤重的铅字版，一天干下来，腰酸腿痛，满脸满手油污，满身臭汗。这年夏天，我整整在车间干了 40 天，繁重的体力劳动和巨大的精神压力把我折腾得十分狼狈。

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们的拼搏精神终于感动了印刷厂的领导和工人师傅。他们把《海洋科学》提到前面加班加点印刷。晚上我们加夜班时，科技文献出版社社长袁维忠同志的夫人，还把热腾腾的水饺给我们送到车间，使我们十分感动。为了表达对他们的感激之情，我们经常从微薄的工资中挤出点钱，买点海米、花生米、葵花子等小礼物送给他们。共同的目标，把我们编辑部和科技文献出版社西苑印刷厂的同志们紧紧地团结在一起。我们既是合作伙伴，又是亲密朋友。经过各方面的共同努力，1977 年九月份，我们的《海洋科学》创刊号终于问世了。它是科学期刊丛林中一株新葩。当我们手持印着彩色封面的《海洋科学》时，个个热泪盈眶，它是一年来我们辛勤劳动的结晶啊！

海洋所许多青年科技工作者的处女作大多是在《海洋科学》上发表的。《海洋科学》为这些同志的成长，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我们对来自全国各地的稿件，也一视同仁，热情对待。记得办刊

初期，我们收到了西安一位作者投来一篇关于波浪发电方面的文章，他所在单位不出具推荐信（当时发表文章都需单位书面推荐），我们请专家审稿后，认为文章的学术水平和应用价值都较高，就破例发表了。作者十分感动，事后他千里迢迢赶来编辑部向我们致谢，并告诉我们他的文章获省一等奖。

很快我们的读者就遍及全国。稿件和赞扬信件从四面八方寄到编辑部，刊物发行量也跃居同类刊物之首。我和同志们感到无比兴奋。

然而，它毕竟是一株刚出土的幼苗，难免满身沾着泥土。况且一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有褒必有贬。有的同志扬言他永远不会再这样的刊物上发表文章，更有甚者说，用这种刊物擦屁股还嫌粗糙。这一切都没有动摇我们办好刊物的信心，相反我们把它作为动力。吕文超同志曾幽默地说：《海洋科学》现在像刚出生的小姑娘，又是鼻涕又是泪，但它终将长成亭亭玉立的大姑娘，这是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为了使它尽快成长，我和编辑部的同志不耻下问地请教老编辑；请各研究室主任及课题负责人每周给我们讲一次海洋学知识；派编辑部的同志走出去，到兄弟单位取经、组稿；还与养殖单位建立了长期联系，得到了他们的大力支持与热情帮助，至今这些单位仍然是我们的亲密合作伙伴。

经过一番努力后，《海洋科学》办得生气勃勃，深受读者的欢迎。曾经贬低它的同志也来投稿，有的同志还当面向我们表示

歉意。1985年科学院首次对自然科学期刊评奖时，《海洋科学》在同类刊物中独领风骚，被评为优秀期刊，获先进集体奖。

旧矛盾解决了，新矛盾又出现了，吕文超同志落实政策回部队了，责任编辑的重担就落到了我的头上。当时我是情报室的党政主要负责人，实在力不从心。无奈我只好请求领导“增兵”。此时适逢《海水淡化》刊物移交国家海洋局，于是负责该刊的孙佩锦同志调到了《海洋科学》编辑部，所领导又派来了蔡浩然同志，这样我们的编辑力量就加强了。在同志们的鼎力支持下，我挑起了责任编辑这副担子，走过了六个年头，直到1984年才移交蔡浩然同志。但不久他又调离海洋所，孙佩锦同志也另有他任，《海洋科学》在人力上又陷入困难时期。但经过创刊、发展十多年锻炼的周海鸥同志已成长为一名有经验的编辑，责任编辑自然就落在了他的肩上。他果然不负众望，大刀阔斧地对刊物进行了改革，使其面貌焕然一新。当然这他担任责任编辑这十多年时间里，也遇到了不少困难，诸如经费严重不足，人为因素的干扰等等。但每逢关键时刻，我都义不容辞地为他排忧解难，帮他度过了一个个难关。

时至今日，我可以自豪地说，我为《海洋科学》的创办、发展和壮大倾注了半生心血，我对它是问心无愧的。我之所以能做到这些，还应该感谢我的家人，是他们给了我鼎力支持，使我能一心扑在工作上。我永远不会忘记1977年的除夕之夜，当万家灯火、鞭炮齐鸣时，我和编辑部的同志竟是在京——青列车上度

过的。丈夫带着两个未成年的孩子，眼巴巴盼着我回家过年，为他们包饺子、做新衣，而我却使他们失望了。我欠了他们一份永远无法弥补的情。

1978年夏，正值我的儿子考高中，而我却在北京西苑印刷厂搬铅字版，那真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哪！我不能扔下工作，但又牵挂着考高中的儿子。丈夫在青岛新华书店身兼数职，工作很忙，没有时间为孩子做饭，平日家务活也都是儿子承担。儿子考高中，还要自己买菜做饭，我真担心他考不好。古语：“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确有道理。我的儿子以高出青岛二中录取线120分的好成绩，被青岛二中录取，这对我是极大的安慰。

在家中对我工作帮助最大的莫过于我的丈夫。只要我需要，他总是不遗余力地相助。使我最难以忘怀的是，80年代初，有一次临发稿了才发现稿件不足，这就很难按时发稿了，而耽误一天出版社就要罚款1000元，那时是请人帮助抄稿，稿件都在抄稿人手里，又逢星期日，一时收不上来。在这种紧急情况下，我丈夫骑着自行车，转遍了青岛市市南区，终于找到了抄稿人，拿回了稿件，使得我们按时发了稿，而他却连早饭和中饭都没顾上吃。

温暖的家

作为一个女人，丈夫和家，是自己生活避风的港湾，工作的加油站和事业成功的动力源泉。我有一位肝胆相照的丈夫，有一对聪明活泼的儿女。可是要把我为这个家永远团聚，永不分离，

所付出的心力写下来，真可谓情长纸短了。我与丈夫婚后相距数百里，长达14年。这漫长的两地生活，使我饱尝了人间的思念、渴望和艰难。

我们婚后两地生活的14年里，是国家正处在困难时期，人们生活都不富裕。但对我来说要加上一个“更”字。我的父母要供给我的五个弟弟妹妹上学，需要我这有限的工资资助，海伦的家庭更是紧张的要命。尽管如此，我还是非常乐观。我经常告慰自己：困难是暂时的，挺起胸，咬紧牙，决不能被困难压倒。就这样我走过来这段坎坷的路程。

1963年我刚准备进医院生孩子时，婆婆也暴病住进了医院，在这“孝敬父母”和“为妻儿尽责任”的双重担子面前，海伦毫不犹豫地带着一年来积蓄的30元钱，回到了母亲床边尽孝。而我在没有亲人陪伴的情况下经过两天三夜的痛苦折磨，生下来一个八斤重的男婴，这就是我惟一的儿子徐发强。

儿子出生37天，海伦带着黑纱来到了我们身边。他那疲惫、内疚的表情，使我至今难忘。他告诉我，母亲走了，又给他留下800元的债务。800元，这在当时是个天文数字。但我没来得及想这些，我只想怎样减轻他精神上和经济上的巨大痛苦和压力。我安慰他：“人死了不能复生，债务咱俩一起还。”他十分感激我的宽容和大度。第二天就带着我一口一口积下的10斤粮票，和我给他买的返程车票回校了。

自此以后，我和我的母亲及儿子，仅靠我这 53 元工资和 36 斤（其中儿子 6 斤）粮食定量度日。在哺乳期，每天我也只能吃两顿饭，而且连半饱都不够。说来奇怪，奶水却象涌泉般往外流，湿透了我的棉袄，喂胖了我的儿子，却减轻了我的体重。

1964 年暑假后，我把儿子送进了幼儿园。母亲回到了乡下，经济负担稍有减轻，起码 30 斤定量不用和老母亲分吃了。然而好景不长，不久我又陷入更大的经济危机中。祖母去世，家中欠了债，我不得不从工会互助会借款 30 元寄回家。

俗话说屋漏偏逢连阴雨。这时在乡下搞“四清”的林国军同志突然来信，说他所在的那个大队贫协主任的惟一儿子任全强患脾病，需立即到青住院手术。可小任在青岛举目无亲，家境又十分贫寒，让我想办法。在阶级弟兄生命危急时，我能见死不救吗？我立即把小任接到了我家，像对待自己的亲弟弟（当时他只有 15 岁）一样照顾他。为他联系医院找医生，并与高捷、邹少颐、杨宛香、林美华、亓玲欣等同志一起凑钱凑粮，使他顺利地住进了青医附院动了手术。小任得救了，而我又背上了新的债务，又不得不紧衣缩食过日子。连续多年没添置一件衣服，直到 1986 年我还穿着带补丁的裤子。但令我欣慰的是，苦了我一人，照顾了几家人。我和海伦用来五年时间还清了那 800 元的债；我帮助父母把弟妹都培养成了大学生、中专生；我帮小任恢复了健康和快乐。

两地生活期间，最令我难熬的是孩子生病。特别是深更半夜，孩子发高烧，我一个人抱着孩子上医院，那滋味真不好受。1971年，我儿患腮腺炎并发脑炎，夜间高烧达41℃，我背起孩子就向医院跑。在急诊室里，医生要抽脊髓化验，还要200元住院押金。我曾听说抽脊髓对身体不好，所以我不同意抽骨髓，医院押金我没有钱交。我抱着滚烫的病儿，眼泪不停地流，束手无策。早睡的儿子理解我的难处，一边为我擦泪，一边安慰我：“妈妈，我不要紧，咱们回家吧。”一位好心的医生，把我们母子留在急诊室里，在没交押金的情况下开始给孩子打退烧针。第二天一早，林美华、林国军、李本兆、文琼英等同志就帮我借到了住院押金。14年中我带着两个孩子，熬过了无数个不眠之夜，是我一个人陪孩子到医院，是我一个人承担着孩子的衣、食、住、行，是我一个人为这个家操心受累。

婚后一年多我们夫妻没有见面，海伦法定的假期也被公务占用了。那时提倡“共产党员要做党的驯服工具”，“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工作的事再小也是大事”。我们就是默默地坚守着这些信条，以理智控制着自己的情感。一年中我曾六次路过淄博，而从未下车看望海伦，但每次到达张店车站，我就情不自禁地向车外张望，火车早已开动，我的思绪还是留在那个熟悉的月台上。有时真想“假公济私”下车去看他一眼，而《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的话——一个共产党员，在没有人监督的情况下，也能勤勤恳

愿为党工作，这才是好党员。立即响彻在我的耳边，于是私心杂念就打消了。

到了1966年，我们结婚已达六年之久，可是在我的日记上详细地记载着我俩一起生活也仅有50天。我们的儿子三岁了，见谅爸爸还叫叔叔。

谢天谢地！真是苦尽甜来。文革后期，1973年我丈夫从淄博调来青岛，结束了长达14年的“牛郎织女”生活，我们有了自己温暖的家。我与丈夫志同道合，我们的儿女聪明可爱。从此家中就充满了欢歌笑语、高谈阔论，有时也有激烈的“唇枪舌战”，但没有打骂和哭叫声。这大概是缘于一家人都非常珍惜这个能永远团聚而不分离的迟到的家吧！

我的丈夫是一位坦诚、正直、刚强、光明磊落、大公无私、助人为乐的好同志。

他在淄博从教18年，师生们送给他一对专门为他制作的淄博瓷盘，上面烧印着“清白人间”和“正气浩然”八个大字；他在山东化工学院工作期间，呕心沥血培养年轻干部。年青朋友敬仰他，优秀企业家袁仲雪同志，至今还常常谈到“徐老师是我的启蒙老师，是我人生的一面镜子”；他在青岛新华书店和出版社工作整整20年，人们给他冠以“徐马列”的美称。这些大概就是人们对他的客观评价吧。

在家中他还是好丈夫、好爸爸。

他对我一片真情，几十年如一日。但他却不像一般丈夫那样关怀妻子，为妻子买这买那，做这做那。甚至一生他都没为我买一件衣服，做一顿可口的饭菜。但在大是大非问题面前，他可是我的靠山，是个合格的好丈夫。对我的工作鼎力相助，对我碰到的这样那样问题千方百计帮助解决，在我危难之时，挺身而出保护我。

我永远不会忘记，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中，我被开除了党籍，剥夺了一切政治权利时，他冲破一切阻力从数百里以外的淄博赶来青岛安慰我、支持我、鼓励我。劝我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好好吃饭，锻炼身体。不管发生什么事，他永远和我站在一起。他还怒斥那些抄家的造反派，给他们讲解党的方针政策。

在这种时候，不少夫妻离了婚，情人分了手。而我的丈夫却如此相信我，支持我。使我深深感到“知我者，海伦也”。这种体贴和关怀比给我买多少华丽服饰，做多少美味佳肴都珍贵。他还给我增加了战胜邪恶的勇气和力量，使我在长达数年的磨难中没有沉沦。

他还是个好爸爸，而且是一个严父。他对孩子从生活到学习，以至品德修养等方面都非常关心爱护。孩子的正当要求，他会不遗余力地去满足，孩子的微笑缺点错误他都不放过。他常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功溃于蚁穴”等道理，强调对孩子的教育应从小事抓起。孩子在中、小学阶段，他非常重视学校召开的家长会，无论工作怎样忙，他都尽量争取参加。他常说：“对学

生的教育，学校、家庭和社会三者缺一不可。家长会是学校和家长交流情况的最好时机，一年不就一两次嘛，怎么也不能错过这个机会。”爸爸参加家长会孩子感到无比骄傲。在会上校长和班主任总是对我们的孩子进行表扬，老徐对此并不满足，会后总是和班主任再谈一会，让班主任老师谈谈孩子的缺点。一位杨老师曾对我说，每次家长会我都要在会前搜集对你们孩子的批评意见，否则过不了你们老徐那一关。每次开完家长会，他都召开一次家庭会，原原本本传达家长会精神，鼓励孩子发扬优点，克服缺点，争取更大进步。孩子都感到心里热乎乎的，打心眼里感激他们的好爸爸。

我的儿子徐发强，是一名勇于拼搏、积极向上、知识渊博、善解人意、语言幽默的好孩子。在学生时代，他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是个品学兼优的三好学生。在大学时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有着明确的奋斗目标。刚踏入社会就脱颖而出，是青岛纺织工学院和青岛大学的优秀教师、青岛经济广播电台的特约播音员。深受学生和听众的爱戴。

在家中他是一颗欢乐的种子。只要他在家，家中就欢歌笑语不断，他常常以古今中外幽默的小故事和活灵活现的各种口技，逗得全家人捧腹大笑。他还会以巧妙的手段，使我和他爸爸慷慨解囊，为他买回各种书籍。他爱书，结婚时让我为他专做了两个顶天立地的大书柜。对于前来借书的朋友，他会毫不客气但又十分幽默地说：“你没听说世界上有四种东西不好借吗？房、钱、

妻、书。但您可以每天到我这里看书，甚至我还可以供应您的茶、饭。”此后果然到他家看书的青年朋友络绎不绝，而且有时还在他家吃饭。

他有一个好口才，能言善辩，常常为一些国事、家事、天下大事，把全家人都吸引到辩论中来。有时还争得面红耳赤、最终总是以他的取胜而告终。他知识渊博，经常参加一些智力比赛，不用怎么准备就能获奖。他还经常做学校智力比赛的主持人。他博览群书，写下来上百万字读书笔记，翻译出数十万字的国外侦察小说文稿，积累了几十本古今中外文学精粹。

在家务劳动中他是我的得力助手。在我和他爸爸两地生活期间，当我出差时，是他帮我撑起了这个家。每天到幼儿园接送妹妹，自己洗衣做饭。一个十一二岁的男孩担负着一个成年人的劳动，学习成绩还门门优秀，赢得了学校师长、亲邻好友一片赞扬声，我也因为有这样一个人子而感到骄傲。

在欢乐和幸福中，不知不觉我的儿子就长成了身材魁梧的彪形大汉。求婚者络绎不绝，这使他很烦恼，他决心“先立业后成家”。然而传统的习俗，使他不能无限期推迟婚期，就在27岁那年他结了婚，成立了自己的小家庭，还给我们生了个聪明可爱的孙女——徐婧媛。给我们这个家增添了无限乐趣。

我的女儿徐蕴劼，是一个天真活泼、聪明伶俐的“丑小鸭”。她爸爸非常喜爱她。她竟敢在严父面前撒娇：揪他的胡子，拔他的眉毛，搂搂他的脖子。任凭女儿怎样捉弄他，他总是美滋滋的，

乐呵呵的。亲朋好友都知道女儿是老徐的宝贝。在生活中女儿也处处护着爸爸。当我和老徐下象棋时，尽管老徐的棋艺比我高一筹，但女儿总是站在爸爸一边，为爸爸指点迷津，让爸爸取胜。我们一家都喜欢吃小海螺，隔三岔五我就买上两三斤，晚饭后一家人围在饭桌旁挑着吃。她总是把大个的挑给爸爸吃，有时我佯装生气批评她，她却理直气壮地说：“你挑得快，爸爸挑得慢，你都吃完了，爸爸不是吃亏了吗？”这些琐事都使老徐乐不可支。

爸爸也没白疼女儿，女儿很争气，自小学到大学，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还被评为青岛市的三好学生。她性格温柔，善于团结人。幼时结交的一批小朋友，至今仍保持着纯真无邪的友谊，还经常在节假日邀她们来家里做客。

参加工作后，她是一名埋头苦干、任劳任怨、与世无争的好职工。不少关心她政治成长的领导，都启发她写入党申请书，争取加入中国共产党。对于这些关怀她的人们，她总是甜甜地一笑说：“我不够格”。她究竟怎么想的，我们没有深究，但我们却经常取笑她，说她是我们家的民主人士。

1993年，在她爸爸的主持下，我们为她“娶了”一位上海机械学院毕业的大学生为夫。此人是一位德才兼备的英俊青年。从外貌看似乎他俩有点不相配，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大概因为他俩内在有诸多相似之处，所以婚后生活十分甜美。至今结婚已六年，仍相敬如宾，还生了一个聪明活泼的女孩，我们给她取名王雨亭。是她伴我度过了难熬的岁月。在她的生日时，我为她作

了一首小诗：“元旦佳节普天庆，雨亭适逢今日生。两岁顽童能歌舞，天生一个小精灵。”她高兴得逢人就背，说姥姥为她送了最好的生日礼物。

在这个家庭中，我的地位可以说是至高无上的。丈夫伙同儿女推举我为家长，他们的目的很明确，让我理财、挑家务重担。想想丈夫是有名的甩手掌柜的，儿女都还年轻，自然我就是合适的人选了。几十年来，我身体力行，尽职尽责地为这个家操劳。把有限的资金都用到了刀刃上，吃苦在先享受在后，使全家人及亲友对我这个家中都很满意。丈夫经常教育孩子：“你妈妈是咱们家的功臣，你们都要好好孝顺她。”由于他的言传身教，孩子们都十分尊重我。亲朋好友都愿到我家做客。他们在我们家感到亲切、温暖、舒适、自由。因此我家常年宾客盈门，有一年竟多达二百余人次。

我们这个温暖的家，是三代人共同营造起来的，我们都非常珍惜它。

在病床旁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否极人们总是希望泰来，但泰盛人们总不希望否至！可是1992年12月，灭顶之灾突然降临到我们这个幸福的家庭。我丈夫患了肺癌，顿时全集陷入极端慌乱之中。在朋友的帮助下，他很快住进了解放军总医院，进行了手术。

1993年3月20日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我和青岛出版社的领导及子女、亲友，目送着海伦被推进了手术室。我们守候在手术室外，整个上午我的心里像15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忐忑不安。直到下午一点多，从手术室走出一名大夫，把我叫到一旁征求意见，说是海伦的病情比预想的严重，需进行右肺全切除手术，问我同意否？顿时，我的头像爆炸了一样，两膝酥软，不知如何是好。亲友们也都围拢过来，把目光集中到我脸上。空气像凝固了一样沉寂。医生说过，右肺全切除有很大危险性，它意味着我可能永远看不到海伦的笑容了。不切除或部分切除，就意味着等死。怎么办？我口问心，心问口，不知反复了多少次。这个决心可真难下呀！我把乞求的目光投向了孩子及亲友们，大家又把目光返回我的脸上，谁也没有说话。我明白了，此时此刻，只有我才能做出最后抉择，这是关系到我丈夫的生死存亡啊！我不能把责任推给别人，我咬了咬牙，用颤抖的手，写下了“全切除”三个字，并签上了我的名字。此时凝固了的空气似乎一下解冻了，大夫和亲友们都说这样好，于是海伦就做了右肺全切除手术。直到下午四点他才从手术室推倒了监护室。这时大家悬着的心才落到了实处，人们才察觉到几乎一天没吃饭了。遵医嘱，右肺全切除要向海伦保密，只说切除了一叶肺。

从此我开始了长达三个月的病床旁生活。白天我喂水、喂饭、读报、擦澡、端屎、端尿。晚上伏在他床边迷糊，只要他一有动静，或呼吸声稍微粗些，我就惊觉地起来，但他从不轻易打搅我，

他常说：“这一生从精神到物质上，我给你的太少了，而你却为我做出来巨大牺牲。”我一次又一次安慰他：“谁叫我们是夫妻呢？上帝就是安排我来照顾你。”每次他都是满意地笑笑。

由于医护人员和我的精心照料，再加上海伦的心理因素——他自信切除了一叶肺，对健康影响不大。所以术后身体恢复得很快，不到一个月就基本能自理了。那时我还担负着到科学出版社校对《海洋科学》的任务，他刚能自理就一遍一遍地催我去工作。四月底，我连续几天跑科学出版社，有一次因挤车，我的肋骨软组织挫伤，疼痛难忍。海伦十分心疼我，他拖着病体去找大夫为我治疗，并让我离开病房回招待所养伤，他替我做校对工作。我哪里忍心劳累他呢？我们这对患难夫妻就是这样互相关照着，在医院度过了40个日日夜夜。本打算海伦的病情稳定一下就出院。然而“五·一”节那天，突然祸从天降：早晨护士为海伦打完针后，不多时他全身痉挛，整个身体从床上蹦起来、落下去，反复多次后，呼吸急促，两眼翻白，生命垂危。我以惊人的速度跑出病房，从楼上跑到楼下把医护人员找来。医护人员急速地将各种抢救手段都用上了，海伦的呼吸由急促到微弱，身体由蹦跳到微微颤动。心脏监护仪划出了毫无规则的线条。我紧紧抓住海伦的手，医生忙碌得豆大的汗珠直向下滴。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天一夜的奋力抢救，海伦重要转危为安，原来是药物过敏。事后医生说，如果延误半小时，病人定死无疑。我庆幸自己有年轻时百公尺

13.2 秒的基础，我感谢 301 医院医护人员迅速、敏捷的动作、高超的医术和高度的就死扶伤精神。

这场风波过后，由于过度紧张、劳累，我的心脏病终于发作了，心绞痛、脉搏微弱、血压低到几乎量不到了，脸色铁青、汗流浹背。医生又是一阵紧张的抢救，才使我脱险。我是 20 多年的老病号了，对此我并不紧张，特别是此时此刻，我也顾不了自己，只要海伦安然无恙，我死也无憾了。于是我爬起来后，继续在病房陪床，直到五月底我又到出版社校对了一期《海洋科学》才离开医院，回到了青岛。

此后的三年，是海伦休养生息的三年，也是我既忙碌，又忐忑不安的三年。我要为海伦的衣、食、住、行、医忙碌，为工作忙碌，还要为海伦提心吊胆。因为在所有亲人中，只有我知道海伦的血管里还有栓状癌细胞中活动，随时都有形成癌瘤的可能，一旦转移成新的恶癌，那将是无法救药的。人们常说：“当事者迷”，确实如此，手术两年后，海伦开始盲目乐观，他以为万事大吉了，即停止了气功锻炼、又停止了药物治疗，还拒绝了半年一次的检查。他越是乐观，我的心绷得越紧。看着他一天天消瘦的面庞，我好似万箭穿心。我发动了所有能和他谈得来的亲友动员他吃药、锻炼身体、按时体检，他都不听，他太自信了，对此我一筹莫展，他反而批评我被“癌症吓破了胆”。

1995 年春节是我家鼎盛时期。海伦病情“稳定”，我顺利地通过了正高业务职称，更重要的是小孙女——婧媛的诞生，给全

家带来无限乐趣。除夕之夜，全家人围坐在圆桌旁，观看着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的精彩节目，品尝着满桌的年夜饭，小孙女咿呀咿呀地学语。把海伦高兴得眉飞色舞，谈古论今，直到午夜丝毫没有睡意。他对着还不满八个月的小孙女说：“你知道吧，这就叫天伦之乐。”他的这句话使我的心为之一动，人们常说“乐极生悲”，海伦是不是过于乐观了？我心里暗暗责备他不该过早地说这话。午夜的钟声响了，海伦孩童般地与儿子一起下楼放鞭炮，我和媳妇、孙女则从窗户探头向外张望。震耳欲聋的鞭炮声，把节日的气氛推向了顶峰。不料，鞭炮刚放了一半就嘎然而止，过了一阵又响了起来。随着鞭炮声的停止，我的心又剧烈地为之一震。人们都说鞭炮突然断线，是不吉利的征兆，我默默地祷告：愿上天保佑我们全家平安无事吧。

春节过后，正当我们全家沉浸在幸福之中时，癌魔却偷偷地扩散到海伦的五脏六腑，而他却毫无察觉。在小保姆尚未返回的一个月中，是他在家照顾小孙女，这一老一小，快快乐乐地度过了整整一个月。2月20号，果然应验了“乐极生悲”那句俗语，海伦突然大量尿血。于是他再次住进了医院检查。经查他的肾里、胃里、左肺里、肝里都长满了恶瘤，医生说没有手术的可能了。然而，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的海伦，坚决要求再到301医院检查治疗。在他这种强烈求生的欲望面前，我能说些什么呢？于是3月14号我又与儿子一起陪他到301医院。但祸不单行，一向体壮如牛的儿子，刚下火车就大口大口地吐血，一下子就把我吓懵了。

在这双重打击面前，多亏我大妹本河一家的鼎力相助。她陪儿子去检查，我陪海伦到海军总医院（此时 301 医院已满员）检查。经初步检查，儿子右肺不张，胸腔积水，需立即住院。于是我们决定儿子立即返青住院，我留在北京陪海伦。

儿子从开始吐血，胸部就剧烈阵痛。看着他那痛苦的表情，我心如刀绞。我非常了解儿子的忍受能力，自幼患腮腺炎他都不说痛，脚趾盖砸掉了他也不觉得痛，我常说，这孩子没有疼痛细胞。如今他脸色苍白、头冒冷汗、紧咬牙关，一定是疼痛难忍。但是这个善解人意的孩子，不忍心给生命垂危的爸爸及我增加痛苦，他硬是故作镇静地忍耐着。使我永远不会忘记，当我把他送到火车上，他双手按着胸前，苦笑着向我告别的情景。他说：“妈妈，真难为您了。待我稍有好转就回京照顾爸爸。”可怜的孩子，他做梦也没想到，他永远也回不了北京了。

送走了儿子，我就日夜守护着海伦病床旁。那真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哪！我明明白白知道丈夫不行了，我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他是我 32 年来用心血浇灌起来的，我无时无刻不在默默地为他祷告，而且一天两次与女儿通电话询问儿子的病情，但回答都是“没确诊”。我再也忍耐不住了，我要立即返青照顾儿子。然而丈夫却坚决不愿回青，他苦苦哀求我：“不要对我失去信心，我还有希望，儿子身强力壮，不会有大病。”而我被一种不祥之兆笼罩着。虽然我不懂医，但我预感到儿子的病也决不是小病。“右肺不张、胸腔积液、剧烈疼痛”这能是小病吗？

再说，现代这样先进的医疗条件，什么病十几天还确诊不了，这明明是在向我隐瞒事实真相啊。我越想，在北京就越待不住了，正好此时大夫对我说：“你们要回青岛就快走吧，再晚了就回不去了。”我让大夫帮我做海伦的工作，他还是不通。无奈我只好瞒着他去买了返青的车票，4月1日返回了青岛。

由于北京和青岛温差太大，再加上半个多月的折腾，下车后我就感冒发烧。我想立即去医院看儿子，但还是被女儿阻拦了，她说：“哥哥患肺病，您又感冒发烧，不要去传染哥哥。您在家休息两天，这两天就能确诊。”我半信半疑地听了女儿的劝告，没去医院，也没在家休息，而是在为海伦寻找注射活性菌的医院。当我找到了注射单位，刚跨进家门，准备好好睡上一觉时，海伦心情非常沉重，面部表情冰冷地看着我：“你知道咱们强强患的是什么病吗？”“肺癌！”我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这个可怕的字眼，半个月来自我脑海中早已形成，但像窗户纸一样，我不愿捅破它。然而事实是回避不了的，我侧耳倾听着海伦的话，他说：

“强强刚从医院打来电话，说他患的是中心型小细胞癌，现在已经是右肺不张，胸腔积液，淋巴转移。”顿时，我觉得天昏地转，不知什么时候昏倒在沙发上。当我醒来时海伦已给我含上了硝酸甘油，插上了氧气管。我疯狂地爬了起来，抓起了电话。但是给谁打电话呀，谁能救我的丈夫、我惟一的儿子和我呢？我脑子乱成了一团麻，一个电话号码也记不起来了。许久，我才给弟弟拨通了电话，让他立即来青。海平弟视强强如亲子，强强是他们徐

家一根独苗，此时我只有求助于他了。海平弟弟几小时内就匆匆地赶来，他误以为他的长兄海伦不行了，做梦也没想到他心爱的侄子也倒下去了。当他了解到真相后，这条硬汉子疯了似的，深夜向医院奔跑，然而病房的大门紧闭，他插翅难进，不得不拖着疲惫的双腿又回了家。

在此后的半个月里，我整天以泪洗面，喉咙像被棉花堵塞了一样，不但吃不下饭，连一口水都咽不下去。半个月下来体重就减轻了十多斤。儿子躺在医院病床上，丈夫躺在家中病床上。面对这两位生命垂危的病人，我无法形容我的心境。我有一种亲人被绑缚刑场，我在等待枪响的那一霎那的感觉。海伦、海平弟兄俩此时此刻则镇静得惊人，海平陪哥哥谈论国事、家事、天下大事。每顿饭都让我为他们炒两个菜，兄弟俩喝一杯酒。一天晚饭时，海伦郑重其事地对我说：“本川，端起酒杯，让我们兄弟俩敬您一杯。您是这个家的功臣。我走了，这个家还要靠您来支撑，您不能倒下去！”面对这位视死如归的丈夫，我还能说些什么呢？我泪如雨下，用颤抖着手端起酒杯，三人一起喝下了这杯苦酒。当我想到以后再也没有机会陪丈夫开怀痛饮时，一阵眩晕，身体斜倒在沙发上。

直到四月底，丈夫才住进青岛医学院附属医院。与儿子同住一楼，儿子住六楼病房，丈夫住五楼病房。这给我和女儿带来不少方便，我们可以交换陪床，也可以互相关照。虽然他们父子俩近在咫尺，但开始几天儿子并不知道父亲就在楼下，然而聪明的

儿子，没有几天就悟出了他父亲就在他的楼下，于是他千方百计地避过了妹妹和医护人员的视线，强忍剧烈的癌痛，来到了父亲的病房。两颗濒临泯灭的心相会，我无法用语言形容他们的表情，更难窥探他们的内心世界。我只从海伦的目光里，看到了他对儿子从未有过的爱怜，他的面部突然掠过一阵春风，使人难以置信他是一名生命垂危的病人。从儿子的目光里迸发出对父亲从未有过的尊敬与崇拜。平日父子间为一些国事、家事、天下事，争论得面红耳赤的往事，在这一霎那，相互都谅解了。父子互相情不自禁地安慰着、鼓励着。病房里的气氛是那样宁静、凄苦。不知什么时候，大家都被这一对父子、满腹经纶、生离死别的谈话感动得泪流满面。可怜父子俩还没来得及把内心的话都倾吐出来，医护人员就把儿子扶走了。接着病房里陪床的八位女同志都泣不成声。海伦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不要这样，这个病房里都是些重病号，不要影响他们的情绪。”于是我强忍泪水，对病友家属一个个进行安慰。不久病房里又是一片沉寂。

就这样日复一日地，我和女婿陪丈夫，女儿和媳妇陪儿子。我们娘四个尽职尽责地照顾着他父子俩。五月底的一天，儿子又偷偷下楼看望父亲。这时儿子已病入膏肓，每天靠打吗啡止痛。我和海伦都埋怨他不该下来。他强忍悲痛说：“妈妈，请理解我，我和爸爸见面的机会不多了，就让我们父子再见最后一面吧。”说着他就泪流满面，海伦的表情也十分沉重，用他那干瘦的手拍了拍儿子的肩膀，一句话也没说，我实在不忍心让这两颗垂危的

心互相折磨，我立即扶着儿子上楼。他的步履是那样艰难，走几步就蹲下来，双拳顶着胸部休息一会，而且汗流浹背、脸无血色、呼吸困难。我和女儿、医生、护士一起把他抬上了楼，他躺在病床上，半天不语，泪水不停地流。此时此刻，我完全理解儿子在想什么，我一边为他擦泪，同时泪水也模糊了我的视线。果然这是他们父子最后一次见面。

6月1日那天，我和女儿都在陪伴儿子。一大早儿子就深情地说：“今天是我女儿出世后第一个‘六·一’儿童节，我该送件什么礼物给她做永久纪念呢。”“你说吧，我们替你去办！”我和女儿同声回答。他思索了一会说：“送一本书或一个笔记本吧！”听了他这话，我就冒着蒙蒙细雨，直奔中山路新华书店，我认真地挑选了一本图文并茂的少年成才的精装本故事集。直到中午我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了病房。丈夫、儿子、女儿看到我买回到画册，都十分满意。接着儿子就急不可待地对他妹妹说：“我口述，你代笔，给媛媛写一段赠言吧。”尽管这时他已爬不起来了，但思路仍是那样清晰，他一字一句地口述，连标点符号都运用得很恰当：

亲爱的媛媛：

今天是你来到人世间第一个“六·一”儿童节，爸爸特意买了这本少儿启蒙读物，作为节日的礼物送给你。希望她能作为一颗良种使你在人生道路上，激发出艳丽的花朵。

媛媛，你是在大人经历了很多磨难才来到这个世界上的，预产期过了半个月你还未降生，最后不得不采取使你母亲（田燕）身体遭受巨大损伤的剖腹产方式，才将你接到这个世界上。你出生后，你奶奶（李本川）不顾自己身体严重疾病，照顾和料理了你和你母亲一个多月，为你后来的健康成长打下了基础。

人们常说，生来不凡的人一定会有不凡的成就，你是一个非常聪明可爱的孩子。希望你按照这本书上的道理，扎扎实实地努力进步。不要自恃聪明，不要懈怠，全面发展，长大了成为一名出色的人才。

由于你爸爸病危不能写字，所以由你姑姑（徐蕴劼）代写，最后的名字是我自己写的。

你的爸爸徐发强

1995. 6. 1 日

这篇遗言是他一气呵成的。当他妹妹要往书的扉页上抄录时，他把底稿拿在手里，仔细斟酌了一会后说：“就把第一段抄上去吧，后面的内容我只是想让媛媛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她只有妈妈、奶奶、姑姑三位最亲近的人，让她永远不要忘记祖宗，这是遗嘱，抄在书上不好。这份底稿就请您（指他妹妹）代为保管吧，待媛媛长大懂事了，你亲手交给她。”女儿含泪点了点头，小心翼翼

地把遗嘱保存起来了。那本生日礼物书，儿子亲手交给了媳妇，让她妥善替媛媛保存。

“六·一”以后海伦就下了病危通知。我不得不日夜守护着他的病床旁，但每天还要上楼看望儿子三五次。人们常说：“人到临终时，总希望亲人守候在他身边”，我深有体会。此时此刻丈夫需要我，儿子也需要我，他俩都希望我日夜守候在他身边，看着他们乞求的目光，我的心都要碎了，古语说：“夫妻最近，父母最亲。”我既爱儿子也爱丈夫，但我不能一分为二。我只好把主要精力放在丈夫身上了，对此儿子曾一度对我不满意。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我只好对儿子说了实话，我说：“你爸爸很快就要离我们而去了，请允许在他最后的日子让我多陪陪他吧。”儿子听了我的话，十分内疚地说：“妈妈，真难为你了，我想我可能走在爸爸面前，所以我真希望你能整天陪着我，像我儿时那样，咱们母子俩相依为命，度过我人生最后旅程。”听着儿子的恳求，我怎么也不忍心离开他俩，母子抱头痛哭。最后还是儿子催我回到了丈夫身旁。

海伦整天不食不语，6月4号他突然对我说：“我大概过不去这周了，你把出版社的领导请来，我有话要说。”尽管这是个星期天，但社领导接到我的电话后，立即率一批中层干部来到了海伦身边。海伦双手握着社长的手说：“谢谢大家，耽误您休息了。”社长诚恳地问：“老徐，你有什么话尽管说。”海伦胸有成竹地一字一句地说出了最后几句话：“我的一生最后一站是在

青岛出版社度过的，我尽力了，上对得起祖国人民和父母，下对得起子女。出版社的领导和同志们，在我患病期间给了我无微不至地关怀，我衷心感谢。我马上就要离开这个世界里，儿子不久也将与世长辞，我是家破人亡了。我别无他求，只求我走后把我女儿调到出版社继承我的事业，同时照顾她可怜的妈妈。我最不放心的就是我的老伴，请多关照。”社长连声说：“我答应你的要求，我答应你的要求，你还有什么要求说吧！”海伦毫无血色的脸上露出了满意的微笑，说没有了。此时我在一旁已泣不成声。他又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不要难过，我相信您会顽强地活下去。为了这个破碎的家，为了我和即将离去的儿子，无论如何您要挺住，在九泉之下我也不会忘记您为了这个家所做的重大贡献。”这天海伦显得异常兴奋。

果然不出他的所料，这条刚强的男子汉，经过 36 小时痛苦的挣扎后，终于停止了呼吸。但他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却久久不肯合上。人们都说有心事的人死后不肯合眼睛。我遵照古训，一面给他抚摸眼皮，一面口中不停地祷告：“海伦，您放心地走吧，我会遵照您的嘱咐，顽强地活下去，撑起这个破碎的家，完成您和儿子的未竟事业。”也许是在天有灵，也许是他的大脑细胞还没死，不久他果然闭上了双目，而且面部表情是那样安详，永远摆脱了痛苦。我认真地给他擦洗全身，为他换上了一套漂漂亮亮的新衣裳，让他潇洒地到另外一个世界去。这套衣服买回后曾让他亲自过目，他十分满意，又有点不舍得穿的感觉，他说：“这

样好的衣服让我穿着到火葬场太可惜了。”我说：“您奋斗了一生，又很爱美，前半生因经济生活拮据，结婚时还穿着带补丁的裤子，这次就补上前半生的遗憾吧。”他满意地笑了。

1995年6月10日凌晨4点20分，我送走了相识相爱43载的丈夫后，把无限悲痛深深埋在心底，用微笑面对儿子，整日守护在儿子身旁。再好的演员也难以掩饰内心无限的悲哀，况且我面对的是大学讲师的儿子。他很快就窥测到我内心秘密。一天他突然问我：“俺爸爸走了五天了吧？”我十分惊讶地反问：“是谁告诉你的？”他说：“妈妈，是您的眼睛告诉我的。”是的，母子相依为命32个年头，妈妈内心的任何秘密都瞒不过聪明的儿子。既然海伦去世的消息瞒不住儿子了，于是我就如实地把情况对他说了，大概这是他预料之中的事，所以他并没有特别难过。他只是紧紧握着我的手，满含热泪地说：“妈妈，您真坚强。”

我每天面对被癌痛折磨得死去活来的儿子，心如刀绞。真正尝到了“痛在儿身上，疼在妈心里”的滋味。我这颗破碎的心，几次濒临停止跳动，但一次次都被医生抢救过来。每次醒来后我都想，如果我就此离开这个世界该多好啊，那样我将彻底解脱痛苦与折磨。为了照顾我，我的36位亲朋好友，轮流守护着我和儿子身旁，使我饱尝了人间真情，是他们帮助我度过了那段非凡的日日夜夜，充分体现了人家的真、善、美。

我眼看着儿子那副喜祥顽皮的面孔，一天天消失，思绪万千。儿子短暂而不凡的一生，一幕一幕地浮现在我的眼前。儿子正式

应验了古人的一句名言：“生来不凡的人，一定有不凡的成就。”他折腾了我两天三夜才降临到这个世界上来。一岁半就能背诵毛主席语录和许多古诗。三四岁就非常关心国家大事，无论走到哪里都要听新闻联播节目，而且还能把每天的新闻，复述给别人听。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开幕那天夜里，他在梦中听到锣鼓声，忽地从床上跳起来，拉着我的手就加入了游行队伍中，是这个年仅六岁的孩子，解除了套在我脖子上的政治枷锁。是他那双幼嫩的小手和双肩，帮我挑起了沉重的家务担子。我那 53 元微薄的工资，几乎都是通过他那双小手，一分一分地花出去的，从未出现过差错，即便剩下一分钱也舍不得买一块糖吃。自幼对人对事都有独立见解，从不随波逐流。上小学时，学校经常让学生回家要这样钱，那样钱，买统一的服装，但他一向我行我素，他认为应该服从的就毫不迟疑的服从，他认为没有必要的形式，就坚决抵制，从不给我出难题。他虚心好学，整个大学四年的假期都是在图书馆度过的。他博览群书，知识渊博。刚踏上社会就脱颖而出，成为青岛大学出类拔萃的优秀青年教师。。。。。

正当他风华正茂，向着人生顶峰一步步攀登的时候，死神竟一步步向他逼近，它要使我 32 年的心血付之东流，夺走我我这惟一的儿子。我感到撕心裂肺的疼，几乎要发疯了。

7 月 10 号那天，是我 60 岁生日。众亲友在病房里为我准备了生日“宴会”。已经十多天不食不语的儿子，突然显得很兴奋，他十分内疚地说：“妈妈，您含辛茹苦 60 载，我没给您买生日

礼物，真对不起，以后一定补上。”可怜的孩子他哪里知道，这份生日礼物他永远也补不上了。他兴奋地坐了起来，与我们一起吃她妹妹买来的生日寿桃，吃他杨治家叔叔买来的海鲜佳肴，吃夏爱莲阿姨、王翠娥阿姨买的水果。。。。。。不料，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回光返照”。7月11日下午4点，我可爱的儿子终于离我而去了。我痛不欲生。正如女儿在一篇文章中写的那样：“我从未见过妈妈那样失声痛苦，那真是怎样一种撕心裂肺的痛啊！哭声惊动了整个病房，人们都流下了眼泪。”我紧紧地抱着亡儿不肯撒手。医生硬是把我从儿子身边拉走，在急救室里给我吸上了氧气，含服了硝酸甘油。当我挣扎着再回到病房时，儿子已经不见了，他永远永远地离开了我，离开了他热爱的教育事业，离开了他眷恋的人间。带走了我对他的爱，带走了他的许多未了之情。

一个月内我送走了两位亲人，我常常自问，这难道是真的吗？他们走了，把无尽的思念和痛苦留给了我。我整天整夜望着他父子俩的遗像发呆。女儿做饭时，我不只一次地嘱咐她：不要做得太咸，爸爸不能吃。多做点排骨，哥哥喜欢吃排骨。使得女儿经常泪流满面，无言对答。有人敲门，我立即想到海伦回来了，急忙去开。有人打电话来，我急忙去接，我要听听儿子幽默的声音。我简直成了祥林嫂，见到与我同病相怜的人，就问他们何时能解脱痛苦。他们总是摇摇头，或含泪拍拍我的肩膀，每次都使我大

失所望。渐渐我明白了，对于我来说，治疗苦痛的惟一良药是“死亡”。只有生命结束了，苦痛才能随之结束。

为了跳出这痛苦的深渊，我埋头于工作。除按时完成我承担的编辑任务外，我还联络大学里的几个同学和同时代的女大学生们撰写这本《平凡足迹》。在长达三年的写作过程中，深深感到我这大半生并未虚度，为自己和后人留下了近二十篇论文，并参与编写和编辑了七八本图书，其中《中国海洋科学研究及开发》一书，获全国城市优秀图书一等奖，山东省优秀图书二等奖。回首往事，虽感欣慰，但眼前这命运的急剧跌宕，使自己的情绪很难在短时间内恢复平静，常常彻夜不眠。1997年仲秋之夜，我在荣成海平弟家写下了几句顺口溜，经几次推敲后，现录在下面，以作纪念吧：

今宵月儿圆，独立寒窗前。月圆家不圆，愁绪溢满天。
回想三年前，喜添小媛媛；合家喜团圆，夫儿俱开颜。
今年中秋夜，夫儿邈黄泉。余生何所许，谁能给指点！
昏夜尽辗转，愁苦恨无边。举头望明月，低头自悲叹。
人称女中杰，何须泪洗面；路靠自己走，事靠自己干；
无须乞别人，更不求苍天。老骥虽伏枥，志犹千里远。
再过二十载，回首叙今晚；苦痛抛九霄，夕阳仍灿烂！

现在我可以告慰在天之灵的是，我以全力撑起了这个家，而且在他们走后一年时，被授予青岛市优秀母亲称号，获青岛市妇联等单位颁发的“大地奖”。

结语

这里我就用我女儿徐蕴劼，在为青岛经济广播电台写的一篇文章的片段，作为我这篇文章的结尾吧。

“我的母亲是位平凡而伟大的母亲。说她平凡，是因为她头上没有闪闪发光的桂冠，她只是一名普普通通的知识分子。说她伟大，是因为她为人豪爽，刚直不阿，热情奔放，勤奋忘我，在60余年漫长的人生旅途上，她以惊人的毅力闯过来一道道常人无法逾越的难关。她的同龄人称她是“女强人”，她自己说她是一头拉磨的毛驴，而我则认为她是一位年高德劭的好母亲。

母亲不仅是一位事业型的女性，在家庭中还是一位粗中有细、体贴入微、吃苦在先、享受在后的贤妻良母。买煤、买粮、洗衣、做饭等家务活她几乎全包了，很多人说起她干起活来象在田径赛上竞赛。记得有一个星期天，早晨她把四床被子全拆了，然后用手洗得干干净净，到晚上她又将被子全包做好了。邻居说她干活象个机器人，又快又好。最令我难忘的是，在经济比较拮据的年代，母亲总是精打细算，节约点钱，每周为我们改善两次生活。而所谓的改善生活就是每周吃一次饺子，吃一次煮鸡蛋。一家六口人（还有姥姥和堂妹）她总是煮五个鸡蛋，我们每人一个，她自己却舍不得吃。我和姥姥总是争着分一半给她，爸爸更是心痛地说，怎么就差你一个？母亲总是微笑着说：你们看我身体多么强壮，还需要增加营养吗？直到1986年家庭经济状况好转后，妈妈才和我们一样每天吃一个鸡蛋。

母亲送走了爸爸和哥哥以后，又一头扑在工作上。在外人看来她好像忘记了悲痛，但我知道，每当夜幕降临时，她又将迎来一个不眠之夜。在短短的一个月中，她消瘦了二十多斤，头发一下白了许多，人也显得苍老了许多。一口整齐洁白的牙齿，一夜之间其后牙全酥了，舌头一碰就掉下一块。母亲的坚强意志，使所有认识她的和听说过她的人都肃然起敬。

我的母亲就是这样一位既平凡又伟大的母亲，她在人生的旅途上，以非凡的毅力闯过了一道道难关。

现虽已年逾花甲，还在不遗余力地为海洋科学事业贡献余热。我爱我的母亲，我将终生以她为榜样，坚毅、勇敢、奋进、舍己为人。”